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 思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2期 总第148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宋 好

统战理论与实践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研究 / 王晓芸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领导制度：演进脉络及实践向度

——基于党的领导制度研究的文本回顾及展望 / 陈 朋 魏海涛 阳 林 13

志愿服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探析 / 田双双 黄书嫔 23

民族与宗教

主持人：赵晓锋

共识与团结：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钱再见 史诗悦 29

关于宗教教职人员培养的历史反思——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各级佛学院教育的探讨 / 刘泳斯 张雪松 3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以宁夏为例 / 夏爱军 王 荣 闫 晓 42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新的社会阶层

- 网红群体成长逻辑与统战工作介入路径研究 /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课题组 48
-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统战工作研究 / 张伟伟 吉 强 56
- 党建引领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实践需求与提质路径
——以青年律师高质量发展为视角 / 李海峰 梁鸿飞 孟睿智 66

学习与思考

- 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 / 钟伟云 72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2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研究

王晓芸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共情传播理论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有意义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传而难通”的尴尬困境。统战部门要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面临的时代机遇与严峻挑战,系统筹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从锚定共情主旨、契合共情原则、坚持共情基调、扩大共情空间、寻求共情中介五个方面把握逻辑理路,从传播主体协同化、文化内容多元化、交流渠道立体化、受众细分精准化、效果评估科学化五大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全方位提升中华文化共情传播效果,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推动建立中华文化海内外人文共同体。

关键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相知相通;共情;人文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其中包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是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的新形势下,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显得更加紧迫而重要。准确把握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使命任务和形势变化,有力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积极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是筑牢海内外中华儿女“根魂梦”的重要基础,是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支撑,也是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依托。研究好如何加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华文化“传而难通”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国家之间误解、误读和误判的可能性依然较大,中外民众之间的心理情感距离有待拉近。本研究运用共情传播理论,分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面临的时代

收稿日期:2024-03-01

作者简介:王晓芸,西安社会主义学院文化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和传播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2022年度招标课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助力海内外情感融合——基于共情理论视角”(KT202209)的研究成果。

机遇与现实挑战，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以锚定共情主旨、契合共情原则、坚持共情基调、扩大共情空间、激活共情体验五个方面阐明逻辑理路，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五个维度进行路径探索，积极探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路径，构建海外统战工作新形态。

一、共情传播理论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提供有意义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相知相通总关情。情感是一种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在人类普遍性认知判断中具备主导性、优势性和驱动性作用。

共情是“一种以正确的情感回应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是一种带有认知元素的情感或情绪状态”^[1]。共情从浅入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知”，即传受双方对于对方情感的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将心比心，实现“你同情我、我同情你”；第二阶段是“认同”，即传受双方在感同身受的基础上，进一步消解障碍因素，通过求同存异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理解，实现“你认可我、我认可你”；第三阶段是“行动”，即在求同存异、相互认可的基础上，做到行动上彼此支持，实现“你帮助我、我帮助你”。

从“感知”“认同”到“行动”，共情的实质是主体在识别、理解他人情感后产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共鸣通过行动反馈给对方^[2]。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时刻，海外捐赠物资上印制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句，让人们为之感动，这是一次成功的共情传播实践。海外受众因受所在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因素影响，对异质文化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怀疑和抵触。但当产生共情后，情感融通会促成异质文化圈的受众产生积极预期与行为，诸多传播障碍将得到有效疏通和化解。可见，共情传播对国家、政府、组织乃至微观层面的个

体在文化传播、感召力提升和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具有确定而特殊的重要价值。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正是在共情的基础上形成“共通的情感空间”，从文化传播变成共同期待，从有所了解变成逐步认同，从情感共鸣变成相知相通，从而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最高境界。离开共情，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共情传播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打造全球人文共同体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

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面临的时代机遇与严峻挑战

当前，在海外统战工作中一定程度存在着某些倾向或误解，即把推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话语生产、市场竞争、媒介控制、舆论斗争等文化输出手段和能力。这窄化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问题领域和理论基础，忽视了共情传播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造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传而难通”的尴尬情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加速演变的宏阔背景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面临着新的时代机遇与严峻挑战。

（一）时代机遇

1. “新全球化时代”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提供了历史契机

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拓展了世界发展格局。世界格局由“英式全球化”“美式全球化”迈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全球化时代”^[3]。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推动共建蕴含中华文化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因此，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对人类文明发展责任重大，也正当其时。

2. 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日益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现实自信。

3.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加强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提供了技术支撑

近年来,在国家战略布局下,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国际传播工作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中华文化表达与国际传播受到国际舆论和海外受众的赞誉,彰显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也体现出海外受众对诉诸情感共鸣的跨文化共情传播的认同和肯定。

(二) 现实挑战

1. 美西方的打压严重影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博弈加剧了跨文化传播的难度;“中国威胁论”不断升级演化,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美西方持续妖魔化孔子学院,将文教议题政治化。这些都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和障碍。

2. 文化传播体系自身建设方面的短板弱项制约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一是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看不到”。文化走出去的数量偏少,能展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的正面题材还不多、特色不鲜明,造成国外民间社会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处于空白、陌生状态。二是海外社会对中华文化“看不懂”。对国外民众的文化需求把握不精准,国别区域及分众对象的针对性不强,没有充分做到内外有别,官方语言色彩较为浓厚,导致一些国外民众不理解甚至反感。跨文化传播人才储备不够,民间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三是海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看

不进”。传播内容往往缺少新意和深度,传播趋于同质化,传播形式较为单一,国外民众看了也印象不深,难以形成共鸣,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效果不理想。

3. 文化差异和情感性信任缺失成为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需要跨越的鸿沟

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此如不能加以包容,可能形成文化壁垒,会引发中西方文化交往中的怀疑、误解和防范,使得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误读。

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之一,中华文化不但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且构建着与世界各国的相互情感与信任,形成促进国家间交往合作的情感资本。但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美好历史记忆更待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更待注入深层次的情感动力。

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的逻辑理路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课题。共情传播所蕴含的直指人心的力量,有助于消解交往互动中的观念和情感对抗,塑造民众对“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特征的个性感知与评价。共情传播不仅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助力海内外情感融合的“传播术”,更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好策略”。

(一) 锚定共情主旨,赋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重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提供了价值旨归。

1. 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突破跨文化、跨民族、

跨时空的阻隔，就要注重通过共情讲好故事，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要借助游戏、视频、动画等各种载体整合创意内容、视觉符号、悦耳音乐、非语言符号等通感性叙事方式，使之产生强大的情感调动能力，让文化背景不同的观众能够共情并无障碍地了解中华文化精髓。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项的《美国工厂》讲述一个中国工厂在美国创业改革的故事，片中的共情叙事策略无疑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2. 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

对于文化而言，感召力是指对异文化族群的正向、善意的影响，使其思想、行为逐渐向本文化靠拢、变化的作用和力量^[4]。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从来不是靠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而是通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将中华文化精神上升为超越个体的普遍情感叙事，以实现“近者悦，远者来”的共情结果。李子柒作为一个古风美食类视频博主，以唯美、诗意、浪漫的中华田园牧歌生活方式引发各国网友的情感共鸣，在海外圈粉无数，增强了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感召力与创造力。

3. 增强中国形象亲和力

国家形象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直观地体现着一国的主流民众对他国的融汇情感在内的整体性知觉和评价。文化传播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因为拟人化的情感表达传递出中外友好亲善的精神内涵，激发了外国受众对它的喜爱和追捧，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践证明，具有人文感、民间性、情感化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最易使中国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4. 增强中国话语说服力

要找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跨越意识形态障碍，用具

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事例、素材，讲好中国故事，推进文化交流互鉴。例如，生态文明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2021年，中国以云南野生亚洲象离开栖息地北上事件为契机，抓住对外传播机遇，共情讲好新时代中国保护生态环境故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对自然充满人文关怀的中国，巧妙提升了中国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经指出，“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的能力”，其实这也是塑造国家间共情理解和信任关系的言语实践能力。

5. 增强国际舆论引导力

国际舆论场充斥着大量谣言诬陷与政治偏见，其背后是美西方对中国言论空间的打压、对中国民众国际交往的遏制和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限制，从本质来说是对中国的不友好情感。例如，针对国外对中国疫情的质疑和指责，我们用“洋人的嘴说中国的理”，支持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南京抗疫现场》纪录片，该片在日本上映后，深受当地民众好评，很多人惊叹中国抗疫之有力有效，有关疫情谣言不攻自破。通过共情化解和拆除传播阻隔，使仁者爱人、讲信修睦的中华文化精神被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喜爱、认同和接受，增进海外受众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进而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和情感融合，是增强我国舆论引导力的重要前提基础。

(二) 契合共情原则，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情感力量

共情的实质是主体在识别、理解他人情感后产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共鸣反馈给对方。共情传播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存在共通的原则。

1. 契合话语感染性原则

在共情传播中，感情充沛饱满、节奏鲜明强烈、语气动感有力的语言富有感染性、吸引力和感召力，能够有效沟通传受双方的情感，实现深层次的感情交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体现活的、有生命力、有张力的中华文化内容。例如，故宫

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3.0》艺术展演就是通过现代音视频互动科技再现中华文化历史对话空间,吸引诸多海外中华文化爱好者不远千里前来沉浸式体验中华艺术之美。

2. 契合内容接近性原则

在共情传播中,受众基于对自身文化、语言、风俗等的熟悉,更倾向于接受与该文化、语言、风俗接近的内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强调传播对象的“在场”,选择贴近对象国历史文化、人文风俗和价值逻辑的内容,寻找对话的共同点、兴趣点和贴近性,消弭与海外受众之间的情感距离和关系盲区。

3. 契合行为亲近性原则

共情传播为了满足和引导对象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会在行为中采用亲近性叙事,体现出更多的亲近性、主观性和主动性,使情感传播更具道德感和审美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摒弃“自说自话”的情感疏离,要通过“我和你”共情视角和社交方式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要分类分层分群体研究国外民众的行为特点,在互动中让中华文化贴近外国受众,让外国受众喜欢中华文化,衍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断破圈的动力,呈现出新的传播面貌。

(三) 坚持共情基调,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传播赋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总体目标,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要求,凝聚了各国共识,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与共同情感,最能够激发共同的情感。

1. 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

文化只有交流,才能葆有活力。正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不断碰撞和交流,才客观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各种文化以及生产这种文化的国家、民

族、社会民众的了解,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隔阂也就容易消除。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要加强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成为国外社会读懂中国的桥梁和纽带,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2. 以文化互鉴超越文化冲突

文化只有互鉴,才能提升品质。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并使其成为自身文化体的有机部分,才能让自身充满活力和生命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要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秉持“对话与互鉴”精神,破除“文明冲突论”所代表的不和谐的、陈旧的、过时的思维理念,立足时代高度兼容并蓄,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铸就新的辉煌。

3. 以文化共存超越文化优越

文化共存才使人类文明的天空多姿多彩。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基于不同历史、国情、习俗等因素孕育出不同文明,各有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要有平等共存意识,保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推动世界文化共同繁荣。

因此,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成为建设中华文化人文共同体的必要基础,也应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的共情基调。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要着眼于发掘、体现和唤起共同情感而设置情感议题,激发海外受众在探讨有关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时,实现情感上同频共振,进而实现行为上同向同行。

(四) 扩大共情空间,全方位融通中华文化共情传播场景

触景生情、情因景生、由景及情是人之常情。

要全方位融通中华文化共情传播场景，使得中华文化不仅“传出去”，而且“融进去”，扩大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共情空间。

1. 融通“公传播”和“共传播”的共情场景

“公传播”是自上而下的传播，主体以国家领导人、国家机构、国家媒体、主流媒体等为主。

“共传播”是自下而上的传播，主体以社会大众、民间“草根”为主。“公传播”和“共传播”要有机融通，才能真正激发出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自信和创造力。

2. 融通“自传播”和“他传播”的共情场景

“自传播”是中国人自己向海外受众传播中华文化，“他传播”是外国人向海外受众传播中华文化。“自传播”和“他传播”的有机融通，能够显著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效率与效果。

3. 融通“内传播”与“外传播”的共情场景

“内传播”是面向国内民众的中华文化传播，“外传播”是面向国外受众的中华文化传播。要树立内外一体化的传播理念，整合各类资源，完善中华文化海内外传播格局。总之，要融通多维传播场景，扩大全球、全时、全业、全员的共情空间，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知相通。

（五）寻求共情中介，深层次激活中华文化共情共鸣体验

要突破跨文化传播“传而难通”的问题，就要找到沟通的中介物，即引发传受双方产生相同或接近情感态度的客观事物，以唤起传受双方的“共享表征”。因此，在共情传播中找到共情中介是实现彼此情感相知相通的关键环节。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要积极寻找这种能产生相同或接近情感态度的决定性中介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访问时就非常擅长用当地受众熟悉的语言和思维来阐述观点，减轻中华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群体间的“文化折扣”。例如，对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对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对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虽然表达的是共同的道理，但总能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

耳熟能详的方式让他们既听得懂也听得进。总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遵循对外传播的基本规律，以受众为中心，从引发传受双方共享表征的决定性符号着手，叩开其情感之门，跨越不同政治与社会制度、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藩篱，进而唤起共情，引发共鸣。

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的基本策略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跨文化、跨历史、跨地域、跨媒介的传播，也是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多渠道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形成合力机制才能有较好效果。统战部门要系统筹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把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针对相关人群，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五个维度提升中华文化共情传播效果，促进民心相知相通，推动建立中华文化海内外人文共同体。

（一）传播主体协同化

随着网络传播的普及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对外传播的主体呈现出日益多样的特征，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成为传播领域的趋势。因此，在政府主体之外，需大力推动各个方面多主体协同传播，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获得更大范围的共情效果。

1. 要重视发挥公民个体灵活传播作用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民个体拥有较多发声机会，而且其传播内容因亲和力强、贴近生活、形式灵活等优势更容易被海内外受众所接受，因而他们已成为国家形象塑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培养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人员、民族宗教界中的网络“意见领袖”，让民间力量获得更多成长空间，生长出具有真实活力的统一战线对外传播力量。

2. 要重视发挥华侨华人在地传播作用

华侨华人身上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烙印，

是中外民间交往的使者、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国际交流合作的纽带。要建立健全相关民间组织机构,完善运作规划机制,发挥好华侨华人作为海外民间力量的在地传播作用。

3. 要重视发挥外国友人辅助传播作用

随着中国的发展,愿意传播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要重点培育和引导一批“洋网红”,对国外民众而言,通过他们发声,往往更有可信性和影响力,如海雯娜、马佳、瑞丽、郭杰瑞、大山等。要重视联系、运用、调动好知华友华力量,发挥他们熟知西方文化环境、了解中国文化、贯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促使他们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民心相知相通作出更大贡献。

(二) 文化内容多元化

可从文化信仰、文化理念、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产品五个方面构建可资海外传播的中华文化内容,丰富人们的共情传播载体。

1. 从文化信仰维度创设共情内容

中华文化信仰集中体现于儒释道思想精华,儒家强调仁,释家强调善,道家强调朴,三者合共济,形成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和”气质,也构成了现代话语体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信仰之源。要充分发挥华文教育的优势和作用,从教师、教材、教学各方面,把语言学习、文化教育和文化信仰塑造结合起来,夯实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基础。

2. 从文化理念维度创设共情内容

文化理念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和处世准则。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体现着世界文明体系蕴含的共同规范和共同价值。因此,要从文化理念维度创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共情语境,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3. 从文化仪式维度创设共情内容

文化仪式是中华文化信息系统的外在行为体

现。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乐修内,礼修外”的礼乐教化塑造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与情感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文化仪式对海外受众而言,是一场公开的中国文化展演。要从文化仪式维度创设“中华仪式化生活方式”的共情内容,通过政治仪式、传统节日仪式、人生仪式、大型纪念活动仪式等载体,帮助海外受众重拾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弘扬“礼乐之邦”万古长青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气质。

4. 从文化符号维度创设共情内容

长城、功夫、大熊猫、丝绸、中国美食、太极图、汉字等都是海外受众感兴趣的文化符号。近年来,江苏省连续举办海外秦淮灯会、水韵江苏、海外文化嘉年华等一系列文化传播活动,向海外展示了江苏形象并取得广泛影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从文化符号维度建构共情内容,增强中华文化符号在视觉听觉、文化创意、人物社交、娱乐消费等各领域的象征标识作用。

5. 从文化产品维度创设共情内容

文化产品是中华文化信息系统的外在体现,既体现物质性,也体现符号性,因而是物质功能和符号表征的统一。据江苏省一项面向海外的调查显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中餐、中医、武术。当前要找准海外文化传播的切入点,从文化产品维度积极开拓海外文化市场,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传播中华审美、话语体系与价值观,通过市场手段潜移默化提升中华文化共情力。

(三) 交流渠道立体化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除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渠道外,还要积极打通触发共情的其他渠道,多措并举提升传播效果。

1. 应用好媒体传播渠道

互联网日益成为争取人心的主阵地、主战场、

最前沿，要善于运用网络实现工作广泛覆盖。一是“造船出海”，面向海外建设运营自主可控的传播媒体。二是“借船出海”，积极利用脸书、推特、优兔等海外相对成熟的媒体，面向平台既有用户直接开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活动。三是“共船出海”，拓展与国外媒体合作，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技术共享等方面进行合作，开发海外主流市场，提升海外知名度。

2. 应用好产业传播渠道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可以借助文化刊物出版发行、文化IP授权、视频音频产品开发、文化旅游建设等产业化运作的方式，在满足海外受众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同时，间接开展国际传播活动，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国际传播功能的跨国经济活动，具有形式多样、方法灵活、内容丰富、效果柔性等优势，应成为未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路径之一。

3. 应用好现场传播渠道

中华文化现场传播是通过组织文化品牌推介、文化艺术演出、文化交流论坛等活动，为海外受众营造面对面、近距离、身临其境、实时互动的交流传播模式。现场传播模式的优点是符合精准化、本土化、分众化的传播趋势，受众体验感好、互动性强、参与度高、反馈及时。后疫情时代，中华文化的海外现场传播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受众细分精准化

要以受众为导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语言文化差异、发展现状和对外关系情况，打造差异化、精细化、特色化的共情传播话语体系。

1. 巩固夯实“基本盘”

以海外华侨华人、周边国家（地区）受众、亚非拉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受众、传统友好国家（地区）受众为“基本盘”，按照地域、职业、教育水平、年龄等指标进一步细分。统战（侨务）部门发挥地缘、亲缘优势，多开展教育、科技、

文化、体育、旅游、考古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基础力量，促进民心相知相通。

2. 高度关注“重点盘”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点盘”是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和智库。西方传媒和智库聚集了大量高级专家，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认同会深深地影响国际社会。因此，要谋求分众化表达方式，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面向西方传媒和智库，通过专业交流、学术研讨、组织访问等形式，提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针对性，这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领域。

3. 精准把握“突破口”

对于普通大众这一受众群体，可以通过运动、艺术、发展等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多多打造诸如“国际友人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文交流平台载体，着重加强互动交流。例如，在大型文化活动、国际赛事等举办之际，在全球范围组织和吸引国际友人通过短视频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并组织优秀作品的创作人来国内参观访问，从普通人中挖掘出“代表人”。

（五）效果评估科学化

为保障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体系的有效构建并产生实效，要建立规范合理的效果评估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成效时，不能仅仅使用社交网络平台账号的粉丝量，作品的点播量、点赞量、转发量和评论量等数量指标来进行单一评估。这些数量指标更多体现出传媒层面的效果，而很难真正衡量文化作品在实现共情和促进认同方面的效果。因此，要探索建立以国家形象、传媒信息、受众情感的三维框架，覆盖短期、中期、长期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具体项目方案、组织管理运行和整体传播效果等情况进行分别评估，尽量使评估结果反映实际情况，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共情传播效果、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的依据。

五、结语

共情传播理论为突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传而难通”的现实困境，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提供了创新而有意义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作用，着力以共情传播为切入口消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隔阂，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相互配合，建立跨文化、跨国家、跨民族的海内外人文共同体，促进海内外民心相知相通，为汇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里夫金. 同理心文明 [M]. 蒋宗强,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8.
- [2] 李成家, 彭祝斌. 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 [J]. 现代传播, 2021(5): 65-69.
- [3] 史安斌. 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J]. 国际传播, 2018(5): 1-5.
- [4] 李宛真, 刘东建. 中华文化感召力在海外传播中面临的机遇与提升策略 [J]. 中国报业, 2021(23): 50-51.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5.

责任编辑: 宋好

党的领导制度：演进脉络及实践向度

——基于党的领导制度研究的文本回顾及展望

陈朋 魏海涛 阳林

摘要: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推进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党史党建、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积极关注这一议题，从基本内涵、历史回顾、价值功能、生成逻辑、完善路径等方面对党的领导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已有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是，相关研究还需在内容上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研究，在视角上进一步拓展整体性的历史分析，在实践做法上进一步开展案例分析。

关键词: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建设；国家治理

当前学术界关于党的领导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党的领导制度的概念内涵、历史回溯、价值意蕴、演进逻辑、实践路径等议题展开，既有成果丰富。但还需进一步明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概念、拓宽研究视角、紧扣问题导向以及扎根中国土地，突显中国特色^[1]。因此，全面深入梳理分析党的领导制度相关研究成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对党的领导制度的学理认识。

一、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领导制度明确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制度是将党的领导这一原则贯彻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阐释。王春玺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从狭义上看是指党内领导制度，从广义上看是指由党内领导制度与党领导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等的各项制度组成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2]。周建伟从系统论视角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涵，认为其是由党和国家权威机构制定的，明确中国

收稿日期：2024-02-28

作者简介：陈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基层治理；魏海涛，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阳林，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和规范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和“权威—服从”关系，以增进信任、驱动治理、促进发展，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目的，可理解、可执行的规则体系^[3]。还有学者从“四力”角度思考分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许正中、陈阳波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全面的整体领导系统，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该系统的集成部分^[4]。康乐、臧秀玲通过梳理制度体系层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可以分为党内制度领导力、政党制度领导力和党外制度领导力三大层级，以党内制度领导力为基础、以政党制度领导力为衔接、以党外制度领导力为统率，遵循“控制—整合—扩散”的逻辑进路，能够实现党的制度领导力从自身组织到政党政治再到国家治理的纵向嵌入、横向覆盖和全面激活^[5]。

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对于巩固执政地位尤为重要。刘华超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旨在巩固和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保障的综合多元制度体系，主要是指党在实施内外领导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体制、机制和程序等各要素的系统集合^[6]。还有学者从党的领导制度与我国国家治理优势之间的关系角度进行理论阐发。齐卫平在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其他制度四部分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基础上，指出党的领导具有顶层决定、全域覆盖、全面指导的特征。因此，党的领导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中居于顶层地位的关键制度，是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中发挥最大优势的根本制度^[7]。

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制度，它们共同构筑起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大厦。陆卫明、孙

泽海基于逻辑论对六项具体制度间的内在逻辑与关系进行论述，认为这六项具体制度并不孤立而存在，亦不是具体制度的简单叠加，而是由首要条件、核心要义、基本要求、力量源泉、重要基点、深层动力六方面形成的一个完整逻辑链^[8]。郭定平、梁君思认为，六项具体制度遵循着制度精神、制度势能、制度半径、制度力量、制度增量、制度内核的逻辑链条^[9]。具体制度的科学设计离不开自洽的逻辑路线，而具体制度的执行要想获得持久的实践动力更离不开制度间的协同运转。唐皇凤、梁新芳依此将党的领导制度细分为六个次级制度，构建起内层核心、中层保护和外层保障的三层结构，认为三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兼容性，辩证统一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10]。

二、党的领导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风霜依旧熠熠生辉，并在革命建设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与党的领导制度息息相关。胡范坤、刘世华立足百年历程的大视角分析党的领导制度，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具有逻辑性、多维性和整体性的科学体系，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持续走向成功、走向胜利、走向强大^[11]。党的领导制度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独属于自己的应然与必然。方涛从价值、实践和时代三个维度考察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经验和时代发展潮流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受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2]。

（一）演进历程

党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系统梳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实践，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以及经验启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对于把握历史规律，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建设起到重要的参考

作用，有助于树立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为此，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一制度的建设过程进行划分。周长鲜、韩强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概念，将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作为参照节点，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初步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和制度初创阶段、改革和调整阶段、明确和规范阶段以及体系化构建阶段^[13]。贺东航则从历史发展分期出发，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调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善^[14]。此外，还有研究关注特定时期党的领导制度中的具体实践。车宗凯聚焦民主革命时期，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领导、自身组织建设的领导等方面进行分析^[15]。石佑启、李坤朋聚焦新时代一系列创新实践，指出当下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以强化党的领导职责为主要内容、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为重要目标、以规范党的领导行为为重点任务^[16]。

另一部分研究基于历史进程的动态视角，深入分析党的领导制度的发展特点。王瑜认为突出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性、鲜明的人民性贯穿于党的领导制度全部历史进程，体现着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属性^[17]。而某些具体制度的历史演进也能窥见党的领导制度演进的突出特征。王冰冰认为，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百年建设历程，展现出制定主体逐步规范化和精准化、调整领域逐步宽广化和细分化、文本内容逐步体系化和专题化、制定程序逐步科学化和严谨化的重要特征^[18]。

（二）经验启示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为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了制

度保障。贺东航认为，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始终延续不断强化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一以贯之，必须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9]。王民忠提出，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因其具有“规则明确”的特质而成为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20]。方涛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的发展历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作为出发点和主要目标^[21]。

二是始终坚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只有不断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王民忠聚焦党的组织体系优势发挥，认为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成立且具有严密组织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性质所决定的。这种组织体系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实现^[22]。王冰冰认为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要坚持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23]。周长鲜、韩强在研究中着重强调要健全党的领导的基本制度，必须全面提高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化建设水平。而要实现从党的领导制度到领导制度体系的全面提升，则要通过对外界环境的一系列互动调整来进行积极建构^[24]。

三是健全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健全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内在要求，而健全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核心的制度保障。胡范坤、

刘世华从党的领导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学理关联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内在的要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国家治理的能力,将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两者辩证统一于伟大的治理实践之中^[25]。王瑜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26]。

三、党的领导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功能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活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取向。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具体体现,也必然有着特定的价值遵循。学界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蕴含的价值功能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一) 党的领导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保障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陆卫明、孙泽海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确保我国长治久安和国家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是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根本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27]。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将中国共产党人永恒价值追求不断外化为各种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与体制机制,确保人民意志与意愿的具体落实。马丽以基层治理为研究切入点,认为党的领导嵌入机制融入基层治理,一方面加强了党对基层群众自治的领导,使党对基层社会的政治领导力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基层党的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进一步走向共融共生,使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在我国的基层社会中得到全面展现^[28]。

(二) 党的领导制度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
党的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客观体现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创新。田鹏颖、崔菁颖认为,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重要转化形态之一,它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新篇章^[29]。而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领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创造和理解“中国奇迹”“中国之治”的“制度密钥”。李亚男、王久高把理解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关系作为党的领导制度逻辑起点,提出厘清它们的基本概念和学理遵循,可以从根本上破除思想误区,增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30]。周建伟也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明确了党的领导方式与范围,有助于消除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误解和曲解^[31]。

党的领导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优势,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实践。万银锋、闫妍以社会组织领域中的制度效能转化为视角,认为通过政治领导、政策指引、思想引导、制度规制、改革推动五方面新举措,能有效破除当前党领导社会组织的实践困境,从而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价值功能实现、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实现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定位^[32]。傅夏仙、黄祖辉则以脱贫领域中的制度效果表现为研究案例,认为领导责任体系、资源投入体系、扶贫监督体系和政绩考评体系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具体转化与实践,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实现了真扶贫和扶真贫^[33]。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请示报告制度是重要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对于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发挥着重要作用。王立峰、孙文飞认为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与实践,有助于避免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相悖的情况,减少政治不稳定因素^[34]。

(三) 党的领导制度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实现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高效统筹,确保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实际效果。徐

光春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能使党有力有效领导一切,能从制度上去探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新经验、能为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制度保障^[35]。靳诺则以疫情防控的实际成效来论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必要性,认为其是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制度密码”^[36]。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追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安排,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方针,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路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目标,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六个方面组成,必须统筹发挥各个具体部分的作用,才能产生综合性效应。王江波、游炎灿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追求展开论述,认为其具有提供根本遵循、筑牢领导根基、奠定价值基石的功能^[37]。黎田、王渤飞把重心放在党的全面领导上,认为其价值意蕴体现在创新制度理论、释放制度效能、优化制度建构、提升制度自信等方面^[38]。而刘志礼、白冰认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凝聚整合的政治统合力、部署落实的组织协调力、知行统一的高效执行力的时代价值^[39]。唐皇凤、吴瑞关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一制度目标,认为其适合中国国情,是一套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对发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具有战略支撑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40]。

四、党的领导制度的生成逻辑

(一) 理论之基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在认识和实践相互促进、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党的领导规律性认知,最终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系统概念。胡荣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理论

指引。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应然性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呈现为实然性特征,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制度则是共产党所建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41]。张迪、谭虎娃也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其革命实践中尤其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过程中,就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42]。代江波进一步指出,列宁创造性提出并成功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党内民主和党内集中的辩证统一^[43]。

(二) 历史之维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实践淬炼中不断调适,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黎田、王渤飞回顾革命斗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演进历程,认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创设的经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党立足中国国情创立了党的领导各项具体制度,使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深入党的各条工作战线,呈现出党领导一切的全面形态^[44]。石佑启、李坤朋以执政方式转变为观察角度,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经历了从“政策之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从“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的历程,发展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结果^[45]。

(三) 时代之问

方涛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借鉴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顺应了世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46]。代江波基于对世情、国情的综合分析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力量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从国内形势看,全面改

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制度，因而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7]。

（四）政党之治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力量。陈朋从党的性质地位分析入手，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为己任。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取得领导权并把党建设得坚强有力。因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也是制度治党的内在诉求^[48]。刘吕红以提升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为出发点，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是应对风险挑战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也是解决问题、实现目标以提升党的领导水平的必然^[49]。石佑启、李坤朋站在相同的角度认为，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满足人民期待、发挥法治作用、完善制度建设的关键举措，是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50]。

五、健全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路径

对于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路径，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立足基本原则，从宏观上整体把握领导原则及价值导向；二是完善内容体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容供给与内容革新；三是筑牢思想根基，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四是强化制度执行，从统筹个体与组织层面出发增强执政本领与执政水平；五是夯实保障体系，在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的同时，构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评价体系。

（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陈朋从制度内在逻辑出发，提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双重身份，使得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也必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51]。唐皇凤、

梁新芳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必须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政治定力^[52]。考虑到党的领导是一项系统工程，张振、杨玉城通过系统论视角，提出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势必要遵循系统观念及其方法论，要立足于党的全面领导系统整体、着眼于党的全面领导系统协同，确保党始终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53]。

二是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人民性是由党的宗旨决定的。这决定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必须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对此，许多学者作了阐释。吴林龙、弭宇航认为，新时代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以坚守党的领导价值取向为根本目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这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价值旨归，是新时代完善党的领导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54]。李妍妍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要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55]。

（二）完善体系结构

一是增强内容供给。张志明以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内容为切入点，认为要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56]。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要着重于“体系”进行完善。对此，唐皇凤、梁新芳指出，要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不同次级制度体系或制度单元之间的兼容性、耦合性和协调性^[57]。宣银、李娟、路威平则对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格局的描述，而“体系”表明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系统性和开

放性^[58]。

二是推动内容革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之一即是开放包容，并且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进行内容革新与完善。张振、杨玉城提出，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要不断致力于党的全面领导系统开放，这既是对外部环境变化发展的积极回应，也是立足客观环境变迁的“先手棋”^[59]。王健睿认为，全面领导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为改革发展与社会进化留出制度变革空间，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稳定性与灵活性并存的治理特性^[60]。马玉婕从党政互动的视角出发，提出从制度层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仅要加强党自身领导制度体系建设，而且要对党政体制进行调适与改革，后者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科学性的互动机制^[61]。

三是筑牢思想根基。筑牢党的领导的思想根基是有效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前提。吴林龙、弭宇航认为，夯实思想根基的制度建设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首要前提和基础^[62]。马玉婕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科学指引^[63]。胡荣涛从制度体系的意识形态建设要求出发，认为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要以意识形态建设为着力点推进党的思想领导制度建设^[64]。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黎田、王渤飞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要注重宣传阐释，通过理论阐释、思想传播、观点表达等途径，塑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话语权，从本质、规律层面讲清楚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建构必然性、内容科学性和实践有效性^[65]。

（三）强化制度执行

一是个体层面。党员干部是党的骨干力量，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是对党员干部的全面考验。李妍妍认为，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社会注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依然面临着长期复杂环境的考验和锻炼，要不断适应互联网条件下群众工作的

规律，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内涵、方式、对象的变化，不断增强执政本领，提高组织动员、团结引领、联系服务群众的水平^[66]。唐皇凤、梁新芳针对建设一支治理能力强、执政水平高的专业化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客观需求提出相应设想，认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落实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标准，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富足的人才储备资源^[67]。陆卫明、孙泽海则从干部任用考核的角度出发，认为党的各级组织要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采用日常督查和专项检查等方式，随时掌握“关键少数”的制度执行情况^[68]。

二是组织层面。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加强党在组织层面的建设，确保党的领导制度落实和执行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杨彬彬认为，增强执行效能要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制度，将党的宗旨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宗旨进行价值对接，在凝聚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构筑起国家治理的共同体，这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性制度^[69]。胡荣涛针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提出要以“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推进党的组织领导制度建设^[70]。

（四）夯实保障体系

一是健全法律制度。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王健睿围绕党的领导制度与法律关系进行研究阐释，认为制度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实体的建构与制度过程的有序运行需要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制度化全面领导的根本内核在于实现法治^[71]。党内法规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能够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制度性保障。吴林龙、弭宇航提出，新时代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要以推进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为保障^[72]。马玉婕认为，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法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要求用法治思维进行政党治理，如此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一个可靠的领导主体^[73]。

二是增强监督约束。要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就必须增强对党的领导制度内容、执行和结果的监督约束。杨彬彬认为，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监督实效性，要建构起完善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的监督体系与国家监督体系是相互贯通、同向发力、融为一体的，都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保障^[74]。从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执行监督视角出发，刘吕红认为要不断做实建设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执行体系，构建制度执行的监督约束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有效执行也需要构建起约束监督体系，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结合，以落实制度体系内容、执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真正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75]。

六、已有研究评析及未来展望

（一）既有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

一是在内容上既注重宏观理论建构也注重具体分析。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融合了宏大理论建构与具体现实问题。就宏观理论建构而言，学者重点关注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时代价值等问题。例如，陈朋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已有研究也对相关具体问题展开了分析。例如，对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内涵、基本要素、制度体系科学化、制度绩效评价等问题作出了不同角度的阐释，特别是对党的领导制度的内涵等问题展开了细致分析。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

二是在方法上统筹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的选择对问题分析具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必须寻求科学合理的研究方

法。检视已有研究发现，其中既有规范研究也有实证分析。例如，在规范研究方面，学者对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时代背景、主要议题、内在结构、运行逻辑、顶层设计等给予了关注，通过深入研究，逐渐认识到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等。同时，有学者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实证分析。例如，陈朋等关注廉政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对廉政制度建设的实践举措作出分析，齐卫平等对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探讨。这些实证分析不仅以新的视角丰富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内容，而且凸显了实证分析的重要作用。

三是在研究路径上既有现实分析也有历史梳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对此，已有研究坚持现实与历史两条路径同步推进。通过深入研究，学者们认为党的领导制度不仅是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国家治理体系转型构成一种相互需求的共生关系。同时，不少学者探讨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思路及具体对策，这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历史中蕴含着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内涵和外延随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对此，不少研究者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对历史上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情况作出梳理，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展开分析，这为当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历史借鉴。

（二）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是在内容上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研究。“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政党失去政权或者难以对自身和国家实施有效治理，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制度建设思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树立体系化建设思维。这说明，当前亟须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作进一步探讨，分析领导制度体

系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梳理领导制度建设的历程，总结其中的得失，进而形成再认识。

二是在视角上需进一步拓展整体性的历史分析。对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目前缺少整体性历史视角的深入研究。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对党的领导制度建设作出全面系统的历史梳理，导致有关研究跟不上需要；另一方面，缺乏整体性的历史视角，多数研究单独集中于某个方面的制度或每个时期的制度建设，从而导致相关研究有“碎片化”倾向。党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只有坚持整体性原则才能反映其主题和主线。因此，不仅要重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历史演进，而且要以整体性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制度体系。这种视角无论对于转换研究思路，还是解决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都至关重要。

三是在实践做法上需进一步开展案例分析。就研究方法而言，已有研究未能足够重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案例分析，现有的少量案例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对单一案例的分析。广泛的案例研究有助于以鲜活素材分析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实践状况，进而有助于对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生成过程、内在逻辑、实践进展、总体效能等问题进行多面向分析。因此，需加强案例研究，从中发现共性问题及主要问题。同时，还应重视跟踪研究，对相关案例的发展过程和不同阶段特征进行历时性观察，通过多案例研究和持续跟踪加强实证分析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 [1] 冯钰平. 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研究论析[J]. 领导科学, 2022(6): 142-145.
- [2] 王春玺.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1): 20-28.
- [3][31] 周建伟.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内涵、定位、意义与内在逻辑[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28-37、28-37.

- [4] 许正中, 陈阳波.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人民论坛, 2020(16): 93-95.
- [5] 康乐, 臧秀玲. 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价值意蕴、系统构成与实现机理[J]. 领导科学, 2023(6): 14-18.
- [6] 刘华超.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历史性推进与经验启示[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1): 53-63.
- [7]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根本领导制度的定位问题研究[J]. 理论探讨, 2020(4): 12-18.
- [8][27][68] 陆卫明, 孙泽海.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价值、任务与路径[J]. 中州学刊, 2020(3): 14-20、14-20、14-20.
- [9] 郭定平, 梁君思.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的四重逻辑[J]. 探索, 2020(6): 110-122.
- [10][52][57][67] 唐皇凤, 梁新芳.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构成要素、逻辑结构和优化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7-22、7-22、7-22、7-22.
- [11][25] 胡范坤, 刘世华. 百年视域下党的领导制度的历史演进、显著特征及基本经验[J]. 学术探索, 2022(10): 8-14、8-14.
- [12][21][46] 方涛. 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生成逻辑[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2): 109-117、109-117、109-117.
- [13][24] 周长鲜, 韩强.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探索[J]. 理论与改革, 2020(6): 13-28、13-28.
- [14][19] 贺东航.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历史脉络和重要制度理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5): 49-58、49-58.
- [15] 车宗凯.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生成的历史考察[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3): 120-127.
- [16][45][50] 石佑启, 李坤朋. 论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的发展完善[J]. 学术研究, 2021(12): 1-10、1-10、1-10.
- [17][26] 王瑜. 党的领导制度的历史嬗变、基本特点和经验启示[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 71-77、71-77.
- [18][23] 王冰冰. 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进程与基本经验[J]. 学习与探索, 2021(10): 58-63、58-63.
- [20][22] 王民忠.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百年演进与发展[J]. 理论视野, 2021(7): 62-67、62-67.

- [28] 马丽. 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 嵌入机制及其发展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1): 163-170.
- [29] 田鹏颖, 崔菁颖. 党的领导制度显著优势的学理解析 [J]. 学习论坛, 2021(2): 5-10.
- [30] 李亚男, 王久高.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 [J]. 理论导刊, 2020(5): 24-29.
- [32] 万银锋, 闫妍. 党领导社会组织: 必然逻辑、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J]. 中州学刊, 2020(4): 32-38.
- [33] 傅夏仙, 黄祖辉. 中国脱贫彰显的制度优势及世界意义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2): 5-14.
- [34] 王立峰, 孙文飞.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 实践价值、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J]. 理论与改革, 2021(3): 1-11.
- [35] 徐光春.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J]. 红旗文稿, 2020(11): 4-10.
- [36] 靳诺. 疫情防控成效彰显党的领导显著优势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12): 19-21.
- [37] 王江波, 游炎灿. 党的领导视角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探析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2): 19-27.
- [38][44][65] 黎田, 王渤飞.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依据、价值与路径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3): 30-40、30-40、30-40.
- [39] 刘志礼, 白冰. 习近平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制度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J]. 理论学刊, 2022(1): 15-24.
- [40] 唐皇凤, 吴瑞.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的基本内涵、逻辑结构和健全路径 [J]. 探索, 2020(2): 119-128.
- [41][64][70] 胡荣涛. 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依据、路径与意义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0(4): 66-74、66-74、66-74.
- [42] 张迪, 谭虎娃.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理论、历史与实践维度分析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4): 120-123.
- [43][47] 代江波.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0(8): 52-55、52-55.
- [48][51] 陈朋. 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J]. 行政论坛, 2021(5): 5-11、5-11.
- [49][75] 刘吕红. 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J]. 湖湘论坛, 2021(3): 40-50、40-50.
- [53][59] 张振, 杨玉城. 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探赜 [J]. 学术界, 2021(10): 20-28、20-28.
- [54][62][72] 吴林龙, 弭宇航. 新时代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三个向度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2): 28-31、28-31、28-31.
- [55][66] 李妍妍. 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0(1): 59-61、59-61.
- [56] 张志明. 深刻认识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6): 129-133.
- [58] 宣银, 李娟, 路威平.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0(11): 4-5.
- [60][71] 王健睿.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建设研究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2(3): 94-99、94-99.
- [61][63][73] 马玉婕.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路径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5): 15-21、15-21、15-21.
- [69][74] 杨彬彬.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 概念、特点与实现机制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7): 75-80、75-80.

责任编辑: 鲍跃华

志愿服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探析

田双双 黄书嫔

摘要:志愿服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奉献,是在政府之外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随着注册志愿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志愿服务精神的广泛传播,志愿服务越发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日益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志愿服务这一社会第三方行动的支持与配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这为志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明晰了价值旨归,也为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志愿服务;道德实践;价值

最新的全国志愿者总数年增长曲线显示,我国注册志愿者人数飞速增长,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人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不断提高,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1]，“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2]。新时代,如何发挥志愿服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挖掘志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在价值,已经成为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必须回应的

时代之问。

一、志愿服务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志愿服务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3]。发展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探寻志愿服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价值,首先就要明白志愿服务的内涵,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志愿服务的价值。

志愿服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奉献,是在政府之外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志愿服务是在一定的精神理念指引下,由志愿者组织

收稿日期:2024-03-28

作者简介:田双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西高校重点人文基地政府数字传播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黄书嫔,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2023MSZ010)、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大学生志愿者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023KY0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和志愿者无偿为社会和公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行为，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实践活动。同时，志愿服务也是志愿者利用自己的善心，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资源等投入到为他人、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的无偿援助服务之中。从国际社会来看，由于各国之间在传统、制度、信仰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人们对志愿服务的理解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有机构以无偿性为主要特征来界定志愿服务，有组织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特征来界定志愿服务，也有学者以自觉自愿为主要特征来界定志愿服务。尽管国内外对志愿服务的定义有很多，但其内涵实质是一致的。各种定义的表述虽不一致，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理解志愿服务，其实质均属于自愿、无偿、利他的实践活动。首先，志愿服务是志愿者自觉自愿从事的社会服务活动。自觉自愿是志愿服务的基本特征。志愿服务受志愿者的社会理想和道德驱动，是志愿者出于自己的信念、良知和责任而自愿地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活动，不存在任何的行政命令或义务性约束，没有任何强制性。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志愿服务大辞典》就志愿服务的特点指出，“服务出于个人自愿”^[4]，这一定义对志愿服务强调的也是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突出的是志愿服务的自愿性。其次，志愿服务是不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与经济活动或市场行为不同，其不以营利或获取其他报酬为目的，而是提供非利益相关性的社会公共服务。不计报酬的奉献是志愿服务的真谛所在，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誓词中，参加该组织的志愿者应该做到“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志愿服务把人的尊严、信任、关心他人、服务社会以及基于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最后，志愿服务是一项以利他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广义上指以造福近亲属以外的他人（个人或团体）或环境的所有活动。狭义上是指无偿为

非营利机构工作。”^[5] 志愿服务坚持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始终把公益性放在首位，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求，是一项利他而非利己的公益性活动。

综上所述，作为具有自愿性和利他性的社会公共服务，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发展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志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探究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成为发展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的必然要求。

（一）志愿服务有助于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7] 作为一个具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要带领比以往所有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总人口还要多的人一起迈入现代化。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希望迈入现代化的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国民的整体道德素质处于较高水平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国民整体道德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个国家注册志愿者人数特别是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的多与少。

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 志愿服务是实现人们全面发展、促进个人成长为完整的人的重要道德实践路径。进步精神作为志愿服务的一大亮点，是志愿者在践行志愿

精神中的必然结果。志愿者们在志愿服务中，不仅有助于个人的进步，更助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有进步，所以人们愿意成为志愿者，愿意参与志愿服务。因为有进步，所以社会需要志愿精神，全社会也愿意为更多的人创造弘扬志愿精神的机会和平台，人们也就有更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机会。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我国注册志愿者已达2.32亿人，组建了135万支志愿服务队伍，实施了文明实践、阳光助残、环境保护、为老服务等主题的1127万个志愿服务项目^[9]。这些数据背后彰显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勃勃生机，也更加证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本身也是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中，志愿者人数的多与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断扩大的志愿者群体有利于推进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将以独特的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志愿服务有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志愿服务的本质，就是人们社会参与的一种道德实践。发展志愿服务，在于推动人们把高尚的思想认知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实践。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人们把道德认知转换为道德实践，并在道德实践中有效促进自身的道德认知。新时代，志愿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拿出闲余时间或财物去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志愿精神的支撑下，作为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志愿服务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

作用。

“第三次分配实质上是民众自发的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目标的道德实践活动，第三次分配做得好，既不会伤害效率，又能促使物质生活领域的财富公平和精神生活领域的道德风尚都得以改善，如此，它就能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从事慈善和志愿服务就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道德时尚。”^[12]事实上，志愿服务带动下的第三次分配不属于市场分配，也不属于政府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志愿服务内蕴普惠大众的道义伦理，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能够引发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呈现出参与面广泛、覆盖面广泛、服务内容深入等特点，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广受好评^[13]。志愿服务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覆盖了社会的多个领域，服务的内容多样，在全社会凝聚起了强大的共识，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14]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经济，最关键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富裕的共识。志愿服务的发展为这一共识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凝结了强大的思想共识，有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志愿服务有助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5]我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文明层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

志愿服务“是对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志愿者通过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及有需要的民众，为其提供各种服务进而帮助这些受助对象满足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志愿者的一种社会需求，通过关心和帮助他人，志愿服务使志愿者之间、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产生了亲密温暖的人类情感，这就满足了人们对于爱和归属的需求”^[16]。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注册成为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利用闲余时间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不是金钱或其他利益的驱使，更多的是源于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大家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安全感、获得感以及幸福感持续上升。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提出，“尽管就一般规律来说，我们在低级需要满足之后才能转向高级需要的满足，但值得观察的现象是，人们在满足了高级需要，并获得了价值和体验之后，高级需要会变得具有自治能力，不再依赖于低级需要的满足”^[17]。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自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当这一高层次的需要被满足后，人们就会对这一高层次的需要产生某种惯习，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注册成为志愿者，而且在参与志愿服务后会愈加热爱志愿服务，这也符合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实际。

事实上，人们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求回报地为他人提供服务，自然会得到受助者的尊重，如果长期坚持参与志愿服务，更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因而志愿服务满足了人们被尊重的需求。同时，志愿服务作为人们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式，让人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而产生较大的自我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人们在参与志愿服务的同时也满足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建立在人们自身需要的基础上，满足了人们的

精神需要。随着志愿精神深入人心，将有更多志愿者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主动追求更加高尚的人生目标，他们在不断超越自我的同时也会促进整个社会良好风尚的发展，更好助力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四）志愿服务有助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8]新时代，伴随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理念渐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是带动着众多爱护环境的有志之士加入环境保护行列，其中就不乏志愿者的身影。

在粗放型经济发展中，环境曾经遭受过破坏和污染。新时代，人们感受到国家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天变蓝，水变清”的美好，大家的环保意识在实践中增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环保志愿者行列。目前，志愿服务在环保领域主要涉及环境保护知识宣传、环境保护实践调研、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行动等领域。其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及志愿活动、义务植树志愿服务活动、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环保公益创业大赛等。

以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为例，这项活动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的，在不少城市有了较好的发展，不断地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时勉励他们，“继续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19]。当前，有不少地方政府发出号召，鼓励大家在做好垃圾

分类的基础上主动到所在社区报到,自愿成为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志愿者,这很好地推动了人民群众做好垃圾分类、积极爱护环境的理念和行动。可以说,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志愿活动的举办,提升了人们自身的环保意识,也带动了全体公民保护环境的热情,为创建美丽中国注入了强大的人民力量。

随着参与环保志愿服务的意识深入人心,更多的人自愿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这种志愿环保意识有助于带动整个社会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进而不断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五) 志愿服务有助于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0]。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参与国际事务已成为我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中国志愿者的身影日益出现在国际大舞台,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以团中央、商务部发起实施的重点项目“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为例,自200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派遣数千名青年志愿者服务于海外,他们用专业真诚的服务赢得了国外民众的广泛好评。该项目在充分考虑受助国需要的基础上,与受助国签订相关服务协议,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集中选拔的方式,在约定的时间派遣优秀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赴受助国开展为期半年至2年(一般为1年)的志愿服务。服务地区集中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20多个国家,服务的领域主要有汉语教学、体育教学、医疗卫生、信息技术、农业技术、土木工程、工业技术、经济管理、综合培训、社会发展等方面。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志

愿者在海外志愿服务过程中帮助了外国朋友,也很好地传播了中国声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青春力量。

新时代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志愿服务在新时代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和意义呢?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以自信、包容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其中就有志愿服务文化。然而,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把其在工业文明中建立的自信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形成强势姿态,往往是影响别国,而不善于虚心学习,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感”^[21]。志愿服务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获得了发展,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歧视,尤其是志愿服务文化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让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自身文化的缺陷与不足。志愿服务无形中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打开了新的通道,为各国间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能,更为全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援助世界各国的脚步没有停滞。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但先后向亚非拉和东欧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选派志愿服务人员^[22]。尽管局部依然存在摩擦,各国的主流价值观依然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世界各国之间充满着友爱与互助,并不影响志愿精神获得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与践行。

我们坚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伴同行。随着“走出国门,服务世界”的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近些年中国一直坚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派遣援外志愿者,支持当地发展教育、医疗、体育等,这是中国用实际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在众多援外志愿者中有很多大学生,他们以新时代中国青年志愿者特有的精神风貌,将志愿精神带向世界各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分享中国智慧,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好评。除了对外援助,在当前的国际赛事、会议中,青年志愿者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机会越来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南京青奥会志愿者的回信中强调,“希望志愿者们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热情参与、真情奉献,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用青春的激情打造最美的‘中国名片’,促进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梦相通相融,共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3]。

随着“走出国门,服务世界”的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中国海外志愿服务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世界共同体的认识将不断加深。志愿服务将会成为推动整个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道德力量,更好助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三、结语

微光成炬,德耀中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唯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建设,才能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2][6]民政部编写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25、129、124-125.
- [3]彭柏林.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志愿服务伦理价值分析[J].湖湘论坛,2023(1):25-33.
- [4][5]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中国志愿服务大辞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25、25.
- [7][10][15][18][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2、22、23、23.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 [9]我国注册志愿者已达 2.32 亿,志愿服务队伍 135 万支 [EB/OL].(2024-03-01).<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721449.html>.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 [12]孙春晨.第三次分配彰显道德之光[N].光明日报,2021-10-25(15).
- [13]张翼.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1~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2-41.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16.
- [16]魏娜.志愿服务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
- [17]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6.
- [19]习近平回信勉励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 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N].人民日报,2023-05-23(1).
- [21]谭建光.志愿服务理念与行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8.
- [22]迟云.社会的良心与善行——聚焦社会志愿服务[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89.
- [23]王义明,谭建光.青年公益创业与志愿服务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1.

责任编辑:尔东

共识与团结：统一战线视域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钱再见 史诗悦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政治目标。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政治策略,是党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需要遵循共识和团结两大统战主题。共识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历史传统、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征程中巩固、增进思想政治共识。团结就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社会形态,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把握好统一战线工作原则,做到在思想上凝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共识,在行动上推动民族工作确立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在原则上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关系,以此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

关键词:政治共识;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战线

一、引言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理论体系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连接,既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与共同体理论的跨时空对话,更开创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新境界。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王朝国家“中华”概念与西方语境“民族”概念的结构复合体。从诞生到成熟,中华民族理论始终被赋予社会政治功能,并通过国民整合和民族

聚合的双重路径建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1]。中华民族理论不是“民族”的主张,而是“国家”的理论^[2]。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和抢抓发展机遇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指导下推进中华民族理论守正创新,就是通过建设内部结构稳定、广泛凝聚共识的现代国家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

当前,学界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大致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方面着力论述中华民族理论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主要关注

收稿日期:2024-03-02

作者简介:钱再见,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史诗悦,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代民族主义在国内传播、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理论的转折和党的十八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三个重要时期。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理论服务的目标并不相同，但都离不开国家统一、稳定发展等主题^[3]。该类研究多基于纵向的大历史观，论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着重描述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特点和“合之又合”的共同性特征^[4]，但缺少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横向方面多聚焦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路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百年中华民族理论发展的新形态。有学者认为，建设规模超大而颇具效率的现代国族是中华民族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5]。也有学者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制度基础^[6]，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同时，完成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到自为的发展^[7]。该类研究多侧重现实维度实践路径探讨，在处理好一体与多元关系领域的研究已积累丰富成果，但缺少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本位政治策略的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民族关系是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五大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共识的重要法宝作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增进政治共识统合起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主题结合起来，巩固和拓展了大统战工作格局。统一战线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8]，对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政治性和策略性优势。统一战线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将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注入革命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动力^[9]，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理论话语的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基础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10]。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群众的广泛共识，而政治共识在其中发挥了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政治共识通常是指政治领域共同的意向，是人民群众基于政治实践形成的基本观念、心理过程和整体认知。政治共识的生成与培育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作用，能够通过产生相应的社会规范指导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性，通过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广泛凝聚政治共识，就是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与党的政治意志凝聚在一起，形成对党的总体目标和方针政策的整体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之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样秉持了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的基本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1]这也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在尊重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思想政治共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探索出正确处理政治一体与文化多样关系的科学方式，巩固了思想政治共识，最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目标扩大思想政治共识。

（一）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维系“大一统”思想政治共识

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产生深远影响^[12]。从周公摄政的周朝整体疆域初步形成“大一统”局面，到秦始皇创立封建郡县“大一统”，古代中华在几千年前就已成为集“国土、国民、国民政权”为一体的政治共同体^[13]。与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现代国家议题不同，封建“大一统”是传统王朝国家的普遍政治认同，是集“王土、臣民、王朝”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共同体。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使得古代中华政治共同体呈现

自上而下集权性质的治理方式。王朝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呈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特点。王朝国家与政权的结合程度高，王朝国家与臣民、政权与臣民却呈现松散疏离的状态，自下而上民众与国家的聚合程度较低。

尽管王朝国家时期中华政治共同体对连接国家与民众缺乏有力的社会建构，但在王土、臣民与王朝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以“天子”为秩序中心、层层扩展的同心圆结构，以此引申出“华夷之辨”或“夷夏之防”^[14]。在“大一统”格局下，“华夷之辨”将古代中华大地不同文明程度的人群区分为“华夏”和“夷狄”，是一种华夏本位的早期民族观。同心圆内层文明礼仪程度高的为“华夏”，同心圆外层文明礼仪程度低的为“夷狄”，基本确立了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认同层面的关系。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华夏文化由同心圆结构内部逐步向夷狄地区传播，实现了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的相互学习与交融，二者最终均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一统”格局下，“华夷之辨”并未带有分化各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色彩，相反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追寻探索中，“华夷”一体意识逐步形成，成为中华政治共同体的广泛共识。中华政治共同体既是大一统传统延续的政治产物，更是王朝国家时期古代中华的政治实践形式。在几千年的政治实践中，“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华政治共同体推进“华夷”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意识的整合，确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政治共识。

（二）中华民族近代内外环境打造“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政治共识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传统王朝国家“大一统”格局。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相比，王朝国家社会建构不足导致民众国家概念模糊，国家认同薄弱，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摆脱王朝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成为重要议题。梁启超开创性提

出“中华民族”。此外，梁氏还提倡大民族主义，以此组成一个大民族，摆脱狭隘的民族观，实现了中华民族理论的新飞跃。在时局动荡的内外环境下，中华民族概念及内涵逐步丰富完善并在抗战时期达到稳定状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面对民族危亡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政治共识^[15]，为中华民族救国图存凝聚了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逐渐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理论也在此之上适应国家建设需求，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建设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重要时期^[16]。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一步巩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共识。

（三）中华民族战略方位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政治共识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位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旨在提升国家认同、增进政治共识，从思想到行动上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我国民族工作也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召开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两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民族工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战略擘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17]中国共产

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确立参考坐标,更凝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三方面助力。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国家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能够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认同,增强抵御极端思想的能力,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思想保障。二是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民族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社会支持。三是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保障了各族群众根本利益,为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三、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形态

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致力打造的社会形态,而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中重要的实践面向。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团结的精神,统一战线是中国宪法赋予的极端重要的团结象征^[18]。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着巩固政治共识、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并在新时期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9]“爱国”一词明确了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扩大了统一战线可以团结的范围,将统一战线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领域致力打造的重要社会形态,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民族工作的实践方向。作为统一战线五大关系之一,做好民族工作、处理好民族问题是统一战线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巩固、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运用统一战线法宝促进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这一核心范式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

动力。

(一)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

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实现无产阶级团结联合的力量之源。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基于“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提出各民族团结联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废除私有制才能真正让各民族享有共同的利益,才能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还基于民族平等视角批判了欧洲殖民剥削压迫现象,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为无产阶级反抗殖民压迫提供了理论遵循。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处理民族问题上提出“各民族的工人都应当完全统一”的思想^[20]。列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民族工作、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为指导,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推进民族平等为基础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形成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并强调:“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21]邓小平同志围绕民族团结议题多次在重要场合发表讲话,作出“两个离不开”的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将民族团结思想推进到新阶段,并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22]，“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23]。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民族团结重要思想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实现了民族团结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则性指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

思想与中华民族理论的有机结合,开启了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篇章。

(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前
提基础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满足各民族群众美
好生活需求的基础。历史已经表明,我国各民族
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确立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的命运是相
通的。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长期的对立
和对抗中依然存在着互市等社会经济交往行为,
实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对话,但民族
不平等不团结现象长期存在。随着历史进程发展,
各民族人员交往程度愈加密集,并伴随思想交流,
最终达到文化交融和相互认同,确立了民族团结
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各民族在长期封闭对抗中只
会愈加没落,无法满足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有
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我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才
能得到保障并实现相互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共
产党在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深刻
把握各民族根本利益取向,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
政策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并通过对口援助推动民族地区
的政策倾斜和对口援助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
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系统复杂长
期的过程,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单元都不能
落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
族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升了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与之相对应,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也得到有效巩
固。各族群众文化教育、社会资本和相互认知程
度均得到有效提升,各族群众交往形式日趋多样。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认同和文化
认同得到有效巩固,民族团结也从单一的机械团
结形式逐渐向有机团结转变。在推进共同富裕
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注入了活力,民族团结进一步为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凝聚了社会动力。

(三)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
之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与一体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多元意味着文化多样,一体意味
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紧紧凝聚在一起。文化多样是
差异性的集中体现,是各民族意识生成的内因。
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是对文化多样的有
效引导,并让民族意识服从和服务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民族团结的社会形态需要按照一体的价
值目标完成对文化多样基本现状的塑造和整合,
在基于各民族间共同利益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以此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
治目标。

从构成要素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
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
群^[24]。从政治过程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政治目标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思想。它的存在形
式离不开社会共同体的凝聚,更需要政治共同体
的价值推进,并深受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政策
工具的形塑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遵
循维护中华民族最根本利益的理念。在内部层面,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心理层面的认同机制。这种
认同源自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个体层面的心理
认同。在外部层面,民族团结是社会团结的重要
组成,是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形成相应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作用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

**四、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
路径**

统一战线是策略,是法宝,也是一门科学^[25]。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统一战线,其政治目标
历经谋求民族独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施改
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策略调整,
逐步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新形态。中国共
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

宝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根本原因在于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目标完全契合。统一战线不仅是静态的政治联盟，更是以动态性政治联盟功能来构建共同体^[26]。在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是集命运、价值、责任和行动为一体的共同体^[27]。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局限于社会政治范畴，而是与社会价值、目标责任和行动规范绑定的多维复合体。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为各民族建立共同利益基础，增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共识，巩固民族团结的社会形态，最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力量。

（一）广泛凝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共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主线。在统一战线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围绕各民族共同利益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思想保障。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既深受历史传统留下的文化习惯影响，更建立在利益共同体驱动下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利益基础上。

一是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基础。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基础。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的历史壮举，带动包括广大民族地区在内的欠发达地区打赢了脱贫攻坚仗，让发展成果普惠所有老百姓。这些发展成就只有在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共同的利益基础。

二是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团结的价值追求。只有在保障各族群众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各族群众明确了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

三是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行动规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群众逐渐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族群众逐渐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嵌入，积累下深厚的情感，心理认同显著提升。统一战线将人心与力量落实到具体的民族事务中，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向前发展，广泛凝聚起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共识。

（二）在民族工作领域深化大团结大联合主题

作为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大团结大联合在服务政治目标上具有丰富政治价值功能，同时更蕴含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的具体策略与智慧。从宏观上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均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从这一视野看，中华民族呈现出国家认同为内核、民族团结为外延的结构特征。从中观和微观上看，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不仅是在价值理念上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目标，更为开展具体民族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这就是要致力于民族地区建设，塑造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形态，积极应对国际和国内各种风险挑战，最终维护中华民族最核心利益。

一是树立民族团结的思想观念。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的生命线，不仅关系到各族群众和谐交往，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民族团结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归根结底在于在思想上明确民族团结共识，在行动上致力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从而为民族团结事业保驾护航。

二是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环节，需要各民族在全面充分的交往中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共识，做好各族群众“知、情、

意、行”四重心理过程的教育引导。建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博物馆(体验馆),讲好中华历史文化故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增强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的切实体验,自下而上形成民族团结合力。

三是全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彰显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的重要实践载体。通过以创带建、以创促建的形式在地方上打造一批又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传遍企业、学校、街道(乡镇)、社区(乡村),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的大团结大联合标识。

(三) 科学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

我国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缤纷多样的差异性特征。不同民族民俗文化、衣着服饰、言语习惯不尽相同,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工作原则。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多样性体现了各民族差异性。“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准则。

一是把握好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对各民族核心价值和文化认同起到导向作用。历史上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实现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交融,最终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补共生格局^[28]。中国共产党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展民族工作,在红色革命文化和时代先进文化的支撑下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性。

二是处理好民族间的差异性。民族差异增进了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丰富性。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指导下,摒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正确看待差异性,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差异,在尊重差异中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辩证统一。引导个体民族意识服从、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同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 [1] 周平. 政治学中的民族议题 [J]. 政治学研究, 2020(1): 32-44.
- [2] 曹为. 古今之争与政治重建: 中华民族理论的困境和出路 [J]. 思想战线, 2016(5): 81-88.
- [3] 周平.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J]. 思想战线, 2016(1): 1-8.
- [4] 麻国庆. 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13-23.
- [5] 曹为.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华民族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4-13.
- [6] 常士阔.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3): 1-8.
- [7] 李静, 高恩召. 从自在、自觉到自为: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38-47.
- [8] 陈明明, 李松. 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 路径与逻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6): 1-17.
- [9] 肖存良. 革命化、现代化与社会化: 建党百年以来统一战线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 21-27.
- [10]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12-30(2).
- [11][17]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1-08-29(1)、(1).
- [12] 贺东航. “大一统”治理与中国政治的内生性演化之路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171-180.

- [13] 潘维. 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读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 33-37.
- [14] 闫恒, 班布日. 夷夏关系与“大一统”的历史形态[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198-208.
- [15]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N]. 益世报, 1939-02-13(9).
- [16] 曹为. 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1(7): 4-17.
- [17] 张劲. 团结宪章——宪法的中国意义[J]. 政法论坛, 2014(1): 3-16.
- [1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
- [19] 列宁全集: 第二十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40.
- [20]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4.
- [21] 江泽民.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357.
- [22]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04: 57.
- [2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4.
- [24] 钱再见. 从科学到学科: 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4): 45-53.
- [25] 林华山. 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6): 26-38.
- [26] 齐卫平, 柴奕. 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3): 27-32.
- [27] 张福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向度: 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的生成逻辑与主要内涵[J]. 新疆社会科学, 2021(1): 62-70.
- [28] 史诗悦, 钱再见.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场语境、价值功能与实践向度[J]. 学习论坛, 2024(1): 102-111.

责任编辑: 赵晓锋

关于宗教教职人员培养的历史反思

——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各级佛学院教育的探讨

刘泳斯 张雪松

摘要:虽然宗教界人才培养可以部分借助寺庙丛林教育、经堂教育、社会教育、各级政府相关机构的专题培训等多种渠道,但宗教院校始终是中国宗教界人才培养的主平台、主渠道。本文对1949年以来中国佛教创办的诸多宗教院校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总结经验、直面问题,对佛教界人才培养、中国佛教健康发展、宗教界修学体系建设、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宗教院校;宗教教职人才培养;三支队伍

加强对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培养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工作抓手和切入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院校有序发展,基本形成中高两级、地域布局合理、毕业生能够基本满足需要的宗教教职人员培养体系。

一、中国宗教院校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

佛教、道教传统的丛林教育,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天主教的修院教育等,这些传统的宗教教育,以及近代新式的佛学院教育、基督教神学院教育都对宗教院校教育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9年之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全国性宗教院校,多是不同程度在借助原有佛学院、基督教神学院、伊斯兰教新式学校的基础上创办而成的。1961年后,全国性宗教院校大都开办了研究生班。

1980年,中央统战部批转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恢复宗教学院的意见》,全国性宗教院校开始恢复办学。1982年3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即19号文件,以下简称“1982年19号文件”),中国宗教工作走入正轨。为了贯彻文件的要求,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宗

收稿日期:2023-12-17

作者简介:刘泳斯,中央民族大学宗教与哲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宗教、民间信仰;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中国宗教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03J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事务局《关于开办宗教院校的请示》，明确不仅要办好全国性宗教院校，还要开办一批地方性宗教院校，20 多所宗教院校或进修班纳入筹办计划。此后，中国宗教院校得到快速发展，天主教界创办的宗教院校开始起步，道教界也开办了各类进修班。除了财政全额拨款的宗教院校，出现了一批由各地宗教团体或活动场所部分或全部资助开办的宗教院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地宗教院校的创办开始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

1996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宗教院校工作的意见》（国宗发〔1996〕040 号文，现已废止）对全国各地的宗教院校进行了规范，强调了初中级宗教院校与高级宗教院校的区别，叫停了部分佛教中级佛学院的本科教育，并对校名进行规范。同时，高级宗教院校的本科教育得到推进，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本科班得到了恢复。

进入新世纪，宗教院校的统编教材工作得到推进，特别是爱国主义教程得到推广使用。宗教院校的政治课得到进一步规范，升国旗、唱国歌也形成了制度。宗教院校在外教、留学、教师职称和社保福利，以及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制学位等方面逐步形成规范制度，宗教院校相关权益也得到进一步保障。

目前，中国五大宗教还在招生运营的宗教院校近百所，佛教界创办的三大语系佛学院占全国宗教院校的 40% 以上，基督教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约占全国宗教院校的 25%。

二、中国佛教界创办的宗教院校

20 世纪 20 年代后，以武昌佛学院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高等教育机构勃兴，得到越来越多教界人士的认同。虽然有些比较偏重传统的僧人强调“行持”，一度使用“学佛院”等名称，但最终“佛学院”成为中国现代佛教高等教育机构的定名。1949 年后，“佛学院”的体制得到延续与认可。

1955 年 8 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筹办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一致同意筹办中国佛学院，由喜饶嘉措、赵朴初、

吕澂、噶喇藏、阿旺嘉措、祜巴勐、巨赞、周叔迦、明真、法尊、持松、郭朋等组成中国佛学院筹备委员会。1956 年 2 月，中国佛教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佛学院章程》，组建了院务委员会。1956 年 9 月，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本科部学制 4 年，喜饶嘉措担任第一任院长，副院长为法尊法师和赵朴初居士，教务长为周叔迦居士（后为副院长），教师有吕澂、虞愚、正果法师、观空法师、巨赞法师、叶均、义方法师、明真法师、持松法师等人。1959 年，中国佛学院开设研究班；1961 年 9 月，研究班进一步扩充为研究部，分为教理和教史两个研究组，研究部学制 3 年；1962 年 9 月，中国佛学院成立“藏语系佛学班”，培养蒙藏等民族的藏传佛教僧才。自 1956 年至 1966 年，中国佛学院先后开办了汉语系专修科、本科、研究班、学习班以及藏语班等不同层次的六个班级。汉语系先后毕业、结业的学员有 384 名，藏语班毕业学员 26 名。

1979 年 7 月，中国佛学院成立筹备小组，拟定复学方案和招生简章，采取重点招考、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 18—30 岁，具有初中、高中及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学僧为预科生，学制两年。复学后，法尊法师任中国佛学院院长。

1980 年，在苏州灵岩山寺创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学制 2 年，首届共招收 43 名新生。分院院长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炆法师，常务副院长为明学法师。明学法师在分院开办时，明确提出办学方针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教遵天台、行归净土”。

1981 年，南普陀寺妙湛法师在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复办了佛教养正院，招收僧尼。后又倡议复办了闽南佛学院，并以“修学并重，学用结合”为办学宗旨。养正院后来并入了闽南佛学院。1999 年，闽南佛学院开展研究生教育，延请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方广锬、王雷泉、陈兵等学者和向学法师、济群法师等佛学院教师为导师。2002 年 1 月，首届硕士班 7 名学僧顺利通过论文

答辩。

1982年5月,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创办南京栖霞寺僧伽培训班,由赵朴初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经推荐与考试,该班共招收184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学僧,其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40岁。该班学制1年,主要开设佛教常识、佛教简史、戒律、丛林规制、功课唱念和文化课等课程。1983年,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在该班的基础上成立。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教育是自上而下进行恢复的,先是复兴全国佛教院校,然后以设立分院的形式逐步恢复和创建地方性佛教院校,并制定开办地方宗教院校的具体规定,最初地方院校主要由各地佛教协会创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寺庙发展有所增强,各地兴办佛学院的辅助力量日趋多元化,各类佛学院、佛教学校曾一度达50多所。对此,各级政府和佛教协会适时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引导。

目前,正式运行的佛学院40余所。华北地区有中国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河北省佛学院、五台山尼众佛学院、内蒙古佛教学校,东北地区有哈尔滨佛学院,华东地区有上海佛学院、江苏佛学院、江苏尼众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戒幢佛学研究所、鉴真佛教学院、浙江佛学院、杭州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浙江慈云佛学院、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山东湛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江西佛学院、曹洞佛学院,华中地区有河南佛教学院、武昌佛学院、湖南佛学院,华南地区有广东佛学院、本焕学院、云门佛学院、南海佛学院,西南地区有重庆佛学院、峨眉山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藏语佛学院、四川藏语佛学院阿坝分院、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云南佛学院、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云南佛学院迪庆分院、西藏佛学院,西北地区有法门寺佛学院、甘肃省佛学院、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佛教院校平均在校生约为200人。其中,汉传佛

教院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相对均衡,在校尼众人数略高于男僧人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僧众、尼众佛教教育逐渐探索出一条“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学修一体化”的办学之路。中国佛学院坚持以戒为师、从严治校,以“学修一体化、学生生活丛林化”为准则,实行学校与丛林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将传统丛林生活制度与现代教育体制融合、佛教传统精神与现代教学融合,为培养合格的佛教人才营造完备的修持体制、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环境。学院丛林化,就是让学生居住于一个清净和合的高素质僧团之中,让学生过如法如律的丛林宗教生活,严守上殿、过堂、诵戒等丛林规制,坚定学生的信仰选择,陶冶学生的宗教情操,提升学生的僧格。丛林学院化,就是使学生所居住的丛林,成为具有传统深厚、朝气蓬勃、崇尚知识、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视野开阔氛围的学校,用现代教育方法培养学生,使之有较高的佛学水平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学修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能使学生成为既有高尚的宗教情操,又有深厚佛学和文化素养,品学兼优、学修兼优、解行相应的僧才的良好环境。

三、中国佛教院校面临的问题

现今,中国宗教院校主要分为高级与初中级两大类培养模式,以满足中国宗教界培养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宗教院校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些困境。

(一) 招生问题

除了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等少数几所佛学院外,中国绝大多数佛学院都面临招生困难,很难完成每年计划的招生指标。为了尽量多地招到学生,佛学院普遍放宽招生条件,很多佛学院出现学生年龄普遍大于老师的情况。此外,由于佛学院数量众多,大多数佛学院的生源不足,因而佛学院的学生有很大的选择自由度,一些学生对所在佛学院稍有不满就可能转学,甚至不辞而别去其他佛学院就读,这造成很

多佛学院学生的流失率超过一半以上。

（二）教材问题

中国佛学院在创办之初，就重视编印讲义教材，各门主要课程大都编写有讲义^[1]。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佛教院校教育刚刚恢复，教材极其缺乏。对此，一些寺院和佛教院校，积极收集和翻印了不少古代佛经、佛书，特别是古德撰写的佛经启蒙或纲要性质的书籍，作为佛教院校的教材。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福建广化寺佛经流通处的创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佛教院校不得不采用一些民国年间撰写的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教材。很多佛学院选定教材时还要征求教师的意见，否则选出的教材无人能讲，根据教师的意见选定教材才行得通，当时被称为“因人施教”。在改革开放初期刚刚恢复宗教院校办学的情况下，想要依据教材聘请教师是十分困难的。

1986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制定初、中、高三级佛学教材目录。这一教材目录的制定，不仅初步奠定了中国初、中、高三级佛学院的课程体系框架，而且确立了以佛教理论教材与佛教原典诠释类教材并重的课程体系基本原则。

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并设立佛教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国佛教院校教材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当时在中国佛教院校中编写教材较为系统、质量较高的是河北佛学院系列教材。该院组织了一些在佛学上很有造诣的教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围绕佛教的教理、教史、教制、佛教文化四大方面，出版了一套10册、100万字的佛学院教材。推动这套教材编写的净慧长老，除了关注佛学院基础课程教材的编写，还考虑到了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走向，他特别重视《人间佛教》教材的编写，这对于中国佛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前瞻性。

2005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峨眉山召开佛教教育座谈会，指出“全国各级佛学院的佛学课、文化课教材各行其是，极不统一，造成初、中、

高三级教材重叠，课程重复，缺乏渐进梯次，学僧在初、中、高各级佛学院课程重读现象普遍存在”^[2]。2007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共同组成“佛学院教材调研组”，赴福建、广东、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的佛学院对全国佛学院教材建设进行专题调研^[3]。2010年1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苏州市召开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分析全国佛教教育工作形势，审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委员会五年工作计划》《佛教院校教材编审大纲》《佛学院教学大纲》。会后，以中国佛学院为主体，组织人员编写了《中论述义教程》《华严五教章》《百法明门论》《教观纲宗教程》等佛教院校本科生教材。此后，各级佛学院陆续出版了一批自主编写的佛教专业课程教材。

当前，中国佛教院校的专业课教材主要分为原典教材和佛学理论教材。随着中国佛经流行、注释书籍的普及，原典课程教材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相对而言，佛教理论教材，即概论性和通史性教材不足的问题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也是构建中国佛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三）学历认可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逐渐不再包办分配工作，大学毕业生开始自主择业；同时，随着深化体制改革，中央各部委所办高校逐步移交教育部统一管理。宗教院校的学历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特殊性日益彰显。学历问题在此之前主要表现为宗教院校毕业生的干部身份问题；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宗教院校毕业生的学历不被社会认可，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宗教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以及宗教院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待遇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宗教院校人才培养如何被社会大众认可，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宗教与现代社会

“相适应”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完善教职人员培养的工作路径探索

(一) 建立健全各级佛学院考核评价体制, 优化宗教院校教育资源配置

充分利用宗教院校评估工作, 以评促建, 不断完善宗教院校办学条件, 对于确实不能达标的宗教院校应予停办, 对尚不具备研究生培养条件的佛学院要停招研究生。通过定期评估, 优化包括师资在内的各宗教院校的资源配置, 降低宗教院校在校生的流失率。

(二) 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抓手, 提高宗教院校师生的政治认同

在宗教院校人才培养中, 通过联合培养、教师兼职等方式积极利用普通高校等优质教育资源, 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 落实精通宗教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人才培养要求, 系统构建未来宗教教职人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体系, 在宗教院校师生中确立“五个认同”。同时, 积极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研究工作, 推动中国宗教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 减少办学层级, 落实属地管理

目前, 中国宗教院校有全国、大区(辐射数省)、地方三个层级。今后应该减少办学层级, 落实属地管理, 使全国性宗教院校和地方性宗教院校定位明确、协同发展, 逐步形成宗教院校教育和宗教传统教育相结合, 宗教院校全日制教育和培训、函授等非全日制教育相结合,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结构。

全国性宗教院校和少数优质地方宗教院校应

在办好本科层次教育的基础上, 集中力量做好研究生等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以培养“双通”人才为契机, 努力建设中国宗教教育教学及研究高地, 为其他层级的宗教院校培训师资。普通地方性宗教院校则以专科、本科层次教育为主, 并重点承担本地区在职宗教教职人员的周期性轮训工作。

(四) 进一步规范学历学位认定制度和教师职称评聘机制, 提高社会对宗教院校的认可度

应尽快参照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生管理制度, 学历、学位管理制度, 以及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认定制度, 完善宗教院校的相关管理制度, 让宗教院校的学历和教师职称管理工作有章可依, 并逐步落实相关福利待遇。一是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 在宗教界内部就宗教院校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和教师职称等达成初步共识。二是大力推进宗教院校系统内的“双通”人才培养模式, 借助社会对文史哲、国学、中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学历、职称的认可, 推动社会各界对不同层次“双通”人才的学历和职称的认可。

参考文献:

- [1] 王丽心. 中国佛学院建院和恢复办学历程之回顾[J]. 中国佛学, 2017(2): 79-80.
- [2] 圣辉. 继承传统 适应当代 面向未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J]. 法音, 2005(10): 7.
- [3] 光泉. 吴越佛教: 第十二卷[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 261-278.

责任编辑: 赵晓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

——以宁夏为例

夏爱军 王 荣 闫 晓

摘要:文化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宁夏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汇地带,如今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具有典型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宁夏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基础,通过文化实践拓宽文化空间、开发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媒介,从而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关键词:文化实践; 共同文化; 文化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作为民族地区,宁夏一直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为“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市)”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各个地区的文化元素不同、历史厚度不同,进行文化实践的方式和效果也有差异。本文以宁夏为例,从威廉斯文化实践的理论视角探究宁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

范区建设(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拓宽文化实践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

一、文化实践的基本内涵

文化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在实践哲学的产生、发展脉络中,文化以一条隐含的线索贯穿实践哲学的始终。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培根的“科学-技术”实践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的有益补充,两者的本质都是文化,但是限于文化的具体形态,即所有的实践都是在

收稿日期:2024-03-07

作者简介:夏爱军,银川综合保税区党政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民族政策;王荣,宁夏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政策、民族教育;闫晓,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认同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研究”(19BMZ003)、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关于宁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路径研究”(23NXBMZ03)、银川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对策研究”(23YCSKXM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定文化环境中的实践^[2]。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重点关注文化的社会过程和日常生活,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包括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实践的过程就是通过文化选择、文化阐释和文化创新的方式实现文化再生产^[3],提升文化的价值,认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传承和发展文化。

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建立在情感结构的基础上,他强调文化实践和情感体验。情感结构强调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形成的共同情感经历、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和情感记忆,这种情感结构也在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它不但涉及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且更强调集体经验和文化传承^[4]。威廉斯认为文化实践的目标是通过共同文化构建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即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也是各民族享有的共同文化。文化实践可以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赋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特殊的实践意义。通过文化实践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用共同文化构建文化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文化实践的路径探索

威廉斯认为文化实践的目标是构建文化共同体,通过文化实践可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文化实践拓宽文化空间、开发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媒介。

(一) 拓宽文化空间

“空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又被称为“文化场所”(Culture Place),泛指各种公共文化场所、历史文化街区等,有些人类学家用“文化空间”

特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基本类型,它是一个实体空间^[5]。实际上,文化空间具有历史遗存性和活态传承性^[6]。也就是说,文化空间是人类文化的积淀,人类文化在此空间内传承和发展。

威廉斯认为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制度、技术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文化空间主要指特定文化、历史和地理特征的场所,“空间”不是物理概念,而是指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本文所探讨的文化空间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北内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被称为“塞上江南”,首府银川是民间传说中的“凤凰城”和“兴庆府”,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建城历史,一直为历代王朝的戍边重镇。

在贺兰山地区,历史上有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狩猎放牧,繁衍生息,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态,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7]。宁夏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汇地带,自秦汉以来逐步形成引黄灌区,具有典型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各民族杂居而生、血脉相融成就了这片包容性很强的文化空间,“灵州会盟”就是最好的见证。公元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长安出发到达灵州(今宁夏境内),会见了众多归附大唐的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使者,并在漠北地区设立了“六府七州”,推行郡县制度,将其纳入大唐的行政区划管理,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关系。“灵州会盟”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下民族融合的进程^[8]。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线建设”等多项国家政策的号召下,来自祖国各地的军工企业人员、国有企业员工、科研技术人员等建设者涌向宁夏,为建设宁夏、发展宁夏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宁夏吸引了全国近百万各族儿女创业就业,几十万的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加入了“建设美丽宁夏”的队伍。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宁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多年来宁夏一直保持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不断拓宽文化空间。例如,银川市通过“十进”活动全方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到目前为止,银川等五市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为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奠定良好基础。

(二) 开发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可以开发并创造出财富的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形式及其成果,文化和文化资源能相互转化^[9];文化资源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主要以精神内涵为主要存在形式,源于深厚而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历史底蕴,即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的精神资产^[10]。

威廉斯认为文化资源不仅包括物质的,还包括语言、符号、意义、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些精神层面的资源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财富,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故宫、长城、天坛、坎儿井、布达拉宫等,是中国建筑文化的宝贵财富;江格尔、格萨尔王、玛纳斯等震撼人心的民族史诗,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传承了守护家园、保家卫国的中华民族家国情怀;饺子代表团圆、美好、祥和,石榴代表团结、和谐,中国结是团结、美好、和谐的象征。文化符号是文化实践的基础,它可以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沧桑巨变的共同历史记忆、凝聚中华文化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银川作为宁夏的首府,率先以石榴为原型,创作出“1+6”卡通IP形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宣传符号,目的是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象化的文化符号。“1”代表银川市,“银银”的IP卡通头部用“小石榴”代表各族儿女紧紧相拥;头顶用四瓣绿叶寓意“休戚

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胸前的品牌标识凸显银川地域属性;颈部山纹表达了宁夏各族儿女守护贺兰山生态屏障的信心和决心;身体底部的“几”字形线条代表着黄河,体现宁夏各族儿女都有保护黄河、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的使命。“6”代表银川所辖的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每个地区的IP形象与“银银”相呼应,深入挖掘阐释了地方文化内涵,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支撑。银川“1+6”IP文化符号在公益广告、文创产品、新媒体及传统媒体中推广使用,让各种代表地方特色的“石榴”符号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点滴,让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载体。黄河、贺兰山等文化符号强化了各族群众对宁夏的认识,每个符号背后的寓意承载了宁夏各族儿女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历史记忆。用宁夏独有的文化符号凝聚中华文化价值共识,增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三) 创新文化媒介

威廉斯认为媒介并非单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媒介具有能动性、规律性和选择性,它在塑造文化和社会认知,也在影响信息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他认为文化媒介通过语言、文字、图像、音乐等共享的符号体系促进社会交流、维持社会关系。文化媒介具有综合、能动和开放的特性,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符号信息促进社会的交流和意义的生成。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成为变革的载体、历史的创造者^[1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文化媒介传播作用,强调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2]。如今,网络空间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平台,运用网络传播中华文化,进行文化实践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推动力量。

例如,“银川石榴云”传播中心于2022年正式上线运营,其中“小宁大讲堂”以系列动漫的方式讲述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标识,是各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享映像,也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和精神密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文化最深层次的文明印记和基因血脉。创新文化媒介,拓展“互联网+民族团结”的文化传播途径,使互联网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平台,运用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不断增进各族儿女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互联网的文化实践功能,用“共同文化”构筑中华民族网络共有精神家园,在网络空间中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使互联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

三、文化实践的提升策略

共同体就是一种共享的认同感,它着眼于共同关怀^[13],也就是社会文化合成体。近年来,宁夏各地通过多渠道不断拓宽文化实践路径,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一) 夯实文化实践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实践的思想理论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成就,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终形成了指导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是文化自信^[1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文化自信是文化安全的屏障,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文化自信源于五千多年延绵不断、

驰而不息的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寻找文化自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树立文化自信,在中华历史文物中坚定文化自信,在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创新实践中铸就文化自信。

宁夏各地区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进行自上而下的理论宣讲,通过学深悟透“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在历史文化学习中汲取力量,感受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从而不断夯实文化实践的理论基础。

(二) 夯实文化实践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16]。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情感交融是实现复兴伟业的底气,这份底气源于五千多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强国建设的基础,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将绘就一幅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当前,国内外敌对和分裂势力依旧存在,妄图从文化理论上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同时,现实生活中因语言、习俗、信仰等差异导致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涉及民族问题的网络空间舆情对现实生活形成了隐形的威胁和挑战。在此情形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路径。

宁夏采取多种方式不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一是开展生态移民。从1997年开始,

宁夏启动生态移民工程项目，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百万移民大搬迁工程。例如，吴忠市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搬迁生态移民扶贫安置区，先后安置了宁夏南部山区八县 156 个乡镇、412 个村的各族贫困群众 23.5 万人。又如，从 2011 年开始，银川市先后接纳、安置 25 万生态移民（其中少数民族占 30% 左右）。二是构建互嵌式社会。吴忠市回族人口占比近 55%，体现出典型的民族互嵌式格局，各个社区通过多种多样的邻里节活动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为构建全方位互嵌式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唤醒共同记忆。石嘴山市曾是宁夏乃至西北的重工业基地，因煤而建、依煤而兴，被称为“塞上煤城”，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都产自这里，石嘴山市利用废弃的洗煤厂记录了石嘴山的工业发展历程和历史文化，唤醒了三线建设过程中各族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诠释了“五湖四海一家亲”的民族团结内涵。

（三）夯实文化实践的情感基础

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建立在情感结构的基础上，他强调人们的共同情感经历、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和情感记忆，这种情感结构强调集体经验和文化传承。其中，符号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凝聚共识的重要媒介。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是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国家形象、中华民族精神等独特意义的表达。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图腾，它可以唤醒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灵共鸣，是各族儿女的情感归依。例如，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魂，黄河文化凝结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勤劳务实、开拓进取、团结统一、无私奉献等中华民族精神，黄河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需要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构建以“黄河”为中华文化认同的符号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17]。又如，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符号，

承担着维系民族情感的重任，“钢铁长城”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标识。黄河、长城等中华文化符号凝聚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认同、心理依恋，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文化符号。宁夏在加强文化强区建设的过程中，更加凸显黄河、长城等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建设。例如，很多品牌 LOGO 的设计中都有“几字湾”字样的黄河标识；宁夏吴忠中华黄河楼凸显自身的历史阐释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为各族儿女了解黄河历史、传承黄河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的建设，让各族群众充分感受长城与中华民族的血脉关系，获得共同的文化体验。

四、结语

文化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威廉斯认为文化实践的目标是构建文化共同体。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前提是拥有共同文化或者共同的文化体验，文化实践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通过不同的文化实践方式，让各族群众感受地域文化的差异和中华文化的多元，通过文化实践形成共同的文化体验，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2] 丁立群，张金鸽. 文化实践论：实践哲学的现代形式——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实践理论 [J]. 社会科学战线，

- 2023(7): 1-10.
- [3]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M]. 高晓玲,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337.
- [4]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40.
- [5] 向云驹. 论“文化空间”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3): 81-88.
- [6] 伍乐平, 张晓萍.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6(3): 7-12.
- [7] 哈布日图娅. 凤城儿女一家亲 民族和美共筑梦 [J]. 中国民族, 2020(1): 22-27.
- [8] 张腾. “灵州会盟”及其历史意义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 74-77.
- [9] 檀文茹, 徐静珍. 论文化资源及其功能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2): 12-14.
- [10] 于宏伟, 虎有泽, 林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甘肃实践与经验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5): 19-25.
- [11] 罗伯特·洛根.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 [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77.
- [1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8(2).
- [13]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M]. 刘建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62.
- [14] 曹劲松. 文化自信: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核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1): 1-9.
- [1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2.
- [16]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1(1).
- [17] 王荣, 闫晓. 黄河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1): 90-96.

责任编辑: 赵晓锋

网红群体成长逻辑与统战工作介入路径研究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课题组

摘要: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和访谈结果,系统分析了目前网红群体的类型和具体特征,提出了网红群体成长发展的四重逻辑路径,即技术路径、商业路径、文化路径和个体路径,诠释了互联网技术、数字消费形态、民间舆论场三大因素发展与个体数字劳动的互构。为应对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困境,提出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强化双向沟通,抓住“关键少数”,做好平台治理,建好关系网络,坚持底线思维。

关键词:网红;网络统战;成长逻辑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发展,网络领域出现了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群体,社会上称之为“网红”。他们处于网络传播与社交的中心节点位置,对构建网络社会共同体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或潜在影响力。因此,正确认识、准确把握这一群体,做好这一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理应成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一、网红群体的特征及统战工作价值

“网红”泛指那些在各类网络平台上能够吸引众多网民关注,获得较高人气,并对网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按照网红个体的基本成长方式,可以初步分为娱乐型、生活服务型、知识分享型和网络电商型四大类。娱乐型网红主要是基于网民消遣、放松、猎奇等强娱乐心理需求的内容生产者,多数存在于短视频平台。生活服务型网红

主要存在于各类网络内容生产的垂直领域,如美妆、房地产、美食、旅游、交通、游戏、育儿、运动等,通过一技之长、专业知识、亲身经历或体验等方式,为网民提供相关资讯。知识分享型网红多见于医生、律师、学者、记者等高知人群,属于各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通常提供各种通俗化的专业知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判,传播相关价值观念或行为处事理念,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由此获得关注。网络电商型网红通常以直播带货为主,满足网民的消费需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类网红相互间会有交叉,也可能出现转换,并非界限分明、固定不变。

为进一步理解“网红”概念,需简要分析网红与相关群体的关系。一是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往往关注公共事件,为群体利益代言,

收稿日期:2024-02-25

作者简介:执笔人为张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秘书长;后梦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于茜瑶,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讲师;刘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涉网络意识形态,有引发、引导舆论的主观意愿,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二是网络达人。网络达人是指在某一领域,专业性突出、经验丰富,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多存在于网络消费、网络生活领域。三是网络主播。网络主播主要是指在网络节目或活动中,参与策划、编辑、录制、制作、观众互动等工作,类似于电视台的主持人,多存在于各类网络视频平台。“网红”这一概念则侧重体现个体的被关注度和人气,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达人、网络主播具有了较高人气时,便属于网红。

(一) 网红群体的特征

1. 社会圈层化突出

网红之所以能“红”,其重要路径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和用户的互动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进而获得关注、积累人气。当前,网络传播不再是互联网早期的“点到面”广播式传播,而多为基于社交的社群传播,其圈层化特征较为明显。因此,网红能不能“红”,其“红”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能嵌入多大的圈层,能否拥有连接分布广泛的同类圈层及穿透不同异质圈层的能力。

2. 内部分化明显

网红的社会圈层化特征突出,加之圈层的广泛性和复杂多样性,必然带来网络群体内部分化明显的特点。这个群体年龄跨度大、收入水平差异明显、所处社会阶层多级化、分布地域广泛、所处传播平台各异,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水准、自身素养、思维方式等亦是多元多样。

3. 平台依赖度高

一是媒介平台层面。网红个体对于不同媒介平台的适应性有差异,用户的媒介平台使用习惯也有差异;同时,传播/社交圈层也具有媒介平台属性。这就导致多数网红是基于某类媒介平台而生存。一旦在不同类型媒介平台间进行迁移,他们就会面临不能适应新的媒介平台及较难积累新用户的巨大风险,很可能导致自身网红地位的丧失。二是机构平台层面。目前,网红群体(主

要是视频媒介平台网红),大多与网络商业机构(如MCN机构)进行绑定,或是依靠这些机构的培育、打造而走红,或是与这些机构进行合作,巩固、提升自己“红”的地位。

4. 强经济性与弱政治性相伴

网红产生于互联网Web1.0时代,从产品代言、植入广告、打赏、付费订阅再到直播带货,网红通过人气进行变现的主观动机逐步凸显,经济属性越来越强。应运而生的网红经济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获得了资本的青睐与助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经济属性。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无论是媒介平台方、网络商业机构还是网红个体,大都“只谈赚钱、不谈国事”;媒介平台或机构还通过技术手段或内部制度严防出现违反法律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言论。这导致多数网红不关心、不关注政治话题,成为纯粹的“经济人”。

5. 持续“红”的稳定性弱

由于同质化竞争激烈、机构平台支持力度发生变化、用户审美疲劳或注意力转换、个体能力素养不足等因素,网红这个群体的总体稳定性较弱,很多个体红得快,过气也快,存在周期较短。

(二) 网红群体的统战工作价值

网红群体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内部构成复杂,并嵌入在网络社会空间中的各个圈层,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理应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关注点和着力点。

1.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网红群体处于网络圈层的中心节点位置,多分散在不同网络场域,在引导社会舆论、传播健康大众文化、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尽管多数网红不谈政治、不关涉公共议题,但是,他们对用户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得自身具有意见领袖的基本条件,具备引发、引导舆论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不具备理性思考和正确判断能力的网红,往往借助娱乐化方式博取眼球,产生了大量“三

俗”，甚至违背公序良俗、挑战伦理道德的劣质内容，滋生出各种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负面影响。

2. 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网红与内容生产机构、MCN 机构、平台资本、产品供给端与消费端等相链接时，便共生出网红经济。其中，网红吸引用户关注而产生的流量、与用户间的社交关系均是重要的网络经济生产要素。网红直播带货在大众消费品和农产品领域，能够形成新的产销链和营销模式，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新兴产业。网红流量变现的获利方式，为不同领域、地域、阶层的人群，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催生了新的灵活就业群体。可以说，网红经济在扩大社会消费、提高经济效率、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3.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需要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团结的人越多、团结的面越宽，统战工作成效就越显著。一方面，网红群体具有一定的信息传播能力、舆论影响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可以视为传统统战工作所指的“特殊群众”，他们能够在议政建言、民主监督、维护稳定、凝心聚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网红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群众性。多数网红处于社会的中低层级，而且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领域、各地域、各圈层，实为一般意义上的“广大群众”。他们的言论和诉求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态势和中低阶层群体的利益，是了解群众的重要内容。

二、网红群体的成长逻辑分析

网红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新群体之一。在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心理学中，由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强调，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各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1]。因此，对于网红的成长发展路径探究，不能仅限于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环境，还应包括经济消费结构、数字资本、社会文

化等多元环境。

（一）技术逻辑：网络迭代与移动技术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整个世界由“原子社会”向“比特社会”转变^[2]，按照全球普遍分类标准，可以分为 Web1.0、Web2.0、Web3.0 三个阶段^[3]。

20 世纪 90 年代的 Web1.0 阶段，互联网通过对庞杂无序的网络信息进行搜索、聚合、再现，实现了人类海量资源共享。在“有效聚合与使用”的技术支撑下，一些普通人所生产的私人内容，如文字创作，可以被更多的人搜索到，这让原本离散的价值得以广泛表达。一批网络写手开始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个人形象传播，在网络上走红，最后通过出版书籍和网络付费阅读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他们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

Web2.0 开启了注重用户参与和共享的网络信息时代。作者与读者、权威与非权威之间的区分模糊，生产内容的权力被下放到每一个普通用户，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生产内容，Web2.0 的个性化、去中心化和信息自主权特征开始显现^[4]。这种富含“参与”“展示”和“信息互动”的网络环境，促使更多的普通人成为内容制造者。有更多的人因其在网络上所展示的形象或生产的内容引发网络群体围观与热议而成为网红。与 Web1.0 阶段的网络写手、网络作家不同，Web2.0 阶段的网红从贴吧、论坛的文字网红，发展到微博、博客的图文网红，再发展到短视频网红、直播带货网红等。在这个过程中，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打破了内容生产的时空间限制，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内容呈现方式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的转变，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等技术提高了内容匹配度，这些为普通人的“爆火”进行了技术赋能。

Web3.0 旨在打造一个更虚拟化、更能体现网民个人劳动价值的网络世界。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 等新技术正在模糊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界限。Web3.0 时代发展出了新的网红类型——基于 CG 技术创造出的与人类形象接近的数字化

形象，即虚拟数字人，并出现如 Lil Miquela 一般的虚拟偶像、虚拟网红等新型网络红人。虚拟网红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以独立 IP 身份开发周边产品，在相关的游戏场景、元宇宙场景中产生互动和裂变，得以形成“虚拟网红+元宇宙+NFT 市场+数字藏品”的产业链条^[5]。

（二）商业逻辑：数字经济与新型消费形态

当今世界数字信息资本正在持续超高速增长。资本开始依托数字技术大量收集用户数据信息，通过存储、计算和分析形成大数据，掌握这些大数据的公司为具体的产品销售公司提供促进生产、消费、投资的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数据服务，帮助其进行精准营销。

数字资本也催生了消费主义新形态的诞生。在 Web2.0 去中心化和互动的环境下，品牌要想和人连接，已经不能仅靠传统式广告或靠单向的沟通场域，而是需要塑造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链接点。数字资本发现，数字媒体平台的内容创作者，尤其是可以实现注意力积聚的“人气”内容创作者，是绝佳的“连接者”。产品营销企业开始与数字媒体平台和 MCN 机构合作，打造和培养专属自己品牌的内容创作者。这些内容创作者在资本的加持下，获得了比其他一般内容创作者更多的流量推送与算法加持，获得了拥有更多制作优质内容的经费与技术，从而积累了更多的粉丝和注意力，即社交资产，最终成为网红。网红利用自身的社交资产推动用户消费，从而与资本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数字资本、技术平台、MCN 机构、网红群体构成了一个流量分发与变现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网红是流量、商品与用户的连接器。网红因其人格化的属性与互动能力，柔化了最终的“销售”与“广告”行为，从而大幅提高了内容平台的娱乐流量转化效率。他们能够让那些原本奔着免费消磨时光的用户心甘情愿对非刚需产品进行购买，完成情感消费。从“需求式”消费向“体验式”“情感式”消费的转变仅靠货架、供应链或

物流难以做到，要将娱乐流量转化为交易订单，需要一个肉身的、人格化的过渡中介，这种数字经济所促成的消费模式的改变为网红的成长提供了经济环境。

网红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模式。其中专门从事网红孵化的 MCN 机构为资本进入“网红经济”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切入口，成为网红商业模式的核心，促进网红商业模式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合作。通过 MCN 机构孵化而诞生的网红，在其成长过程中，渗透着技术的理性与商业的规训，因为 MCN 机构在选择孵化对象、制定孵化计划、实施孵化实践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以商业变现作为自身逻辑和终极目标的^[6]。MCN 机构通过人设规划、脚本写作等手段介入其公司旗下网红的生产。另外，在 MCN 模式下发展的网红离不开媒体平台的合作与扶持，MCN 机构会为孵化对象提供流量资源、热门推荐等平台运营，以及合作推广、社群促销等粉丝运营，助推其成长为可以利用自身关注度进行内容付费、广告植入、电商变现以及 IP 衍生品开发的成熟网红。在这种成长逻辑下，网红不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在数字经济下被生产、被规训的“产品”，他们所生产的内容作品更多的是类型化、套路化的流水线式产物。

（三）文化逻辑：表达自我与全民自媒体

工业科技社会催生了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大众媒介相继出现并长期占据舆论传播的主导地位。如今，信息社会促成了新媒体时代、全民自媒体时代。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支撑下，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利用新媒体表达自我。本属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大众媒介的传播权力开始部分下移，互联网技术对个人内容和信息的快速搜索与整合，促使网络意见交流凝聚成一个个价值观念趋同的网民利益共同体。自媒体对于传统大众媒体最大的解构就是将话语权赋予了普通媒体用户，用户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表达

自我，构建自我影响力，实现自我价值。随着平台用户数量增加，部分意见分享者因个性突出、热点匹配度高，逐渐在分享自己观点的过程中获得人气，从而成为网红。

作为广大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自媒体已成为民众社交、情感交流、购物、传播热门新闻、表现自我的重要手段。传统媒体时代多依靠电视剧、电影等传播形式才能成为拥有影响力和大量粉丝的名人，而通过自媒体，普通人可以依靠出众外表、独特魅力，或者个人专业知识和独到见解吸引广大用户的关注，获得不亚于传统名人的关注度和粉丝量。如今，只要在自媒体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并开始运营，就有成为网红的可能。

（四）个体逻辑：数字劳动与价值实现

数字媒体经济赋予了网络空间所有用户“生产者”的地位。在该空间内只要具备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热情和创意，任何人都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内容创作者队伍，成为网红后备军。内容创作者在成长为“时尚博主”“人气主播”等网红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提供内容产品、共享商品信息、公开自己的生活日常来博取关注和人气，最终以各种商品赞助和广告获取收益。这种生产活动虽然以“自愿”“主动”为开端，但其中所伴随的各种知识、内容和感情等新形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意味着他们仍在从事着某种劳动，这与生产物质性产品的劳动不同，是以创意性、独特性、新颖性等为手段来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数字劳动。许多梦想成为网红的社交平台用户已经将这种数字劳动作为未来职业规划，积极进入这个新的劳动场所。

网红和粉丝间的愉快沟通与互动会激活对特定商品的社会群体交流，这种交流作为数字空间创造的资源，已被资本收编，用于商品变现。网红的生产活动也被纳入商业领域。数字经济以追求广告收益的社交媒体平台为物质基础，以参与、交流、合作为原则，让网红的生产内容和粉丝资源转化为数字生产资料，网红看似自发性

的自我展示、自我建构活动，实际上混杂着剥削、动员等看似无法共存的劳动特性^[7]。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网红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开始以商品消费为媒介来展示自己。在拥有更多流量则意味着成功的社交媒体上，网红通过情感经营来塑造商品化的人设以迎合观众的消费需求，让粉丝产生具体的消费和模仿欲望，同时维持红人名声和商品广告流入，逐渐走向自我品牌化的成长模式，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打造人设，以此来创造职业生涯，打造自我品牌。而完成自我品牌建设的网红可以传播更多的信息，自带渠道、流量，成为重要的传播节点，成为新的传播媒介。

三、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地方实践及面临困境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迭代升级，偶然走红和有意策划的网红都在流量变现的时代获得了大量红利，在虚拟空间乃至现实社会展示出一定影响力。因此，网红群体逐步进入统战工作视野，并成为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在此背景下，及时总结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地方实践及面临困境，是做好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帮助网红群体提升政治素养、增强服务意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一）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地方实践

1. 搭建活动平台，打造统战阵地，增强网红群体组织化水平

各地统战部门将“组织起来”作为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分类联系、搭建平台、打造阵地等方式提升网红群体组织化水平，增强群体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新媒体从业人员联谊会、网络文化协会、自媒体联盟等网络社会组织的统战功能，将部分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网红吸纳进来，增强他们的社会联系和组织归属感。例如，南京市依托自媒体中心建立大V群，定期开展座谈。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红群体分类管理数据库，根据群体特征打造新的统战阵地、建立新的统战组织，通

过实施党建引领统战工作，增强网红的群体凝聚力。例如，淮安市牵头成立市互联网行业党委、网络直播行业党委，推动成立市自媒体协会、短视频达人协会等社会组织。

2. 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数据治理，释放网红群体的社会正能量

针对网红群体构成复杂、思想多元的现实表现，统战部门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与群体行为监管。在以联席会议制度为抓手，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合作的同时，通过算法治理和数据监管，确保网络空间风朗气清。一是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分工，提升合作效能。例如，统战部门持续做好网红群体的教育培训和组织吸纳，帮助他们提升思想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强化网络规范，优化算法模型，积极清理有害信息；公安部门依法打击重大舆情事件中的违法活动，进一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二是深入落实《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将健全算法安全治理机制作为互联网治理的新实践，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治理体系。三是加强对地方“头部网红”“腰部网红”的线上沟通、线下走访，发挥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的带动作用。

3. 引导网红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价值，鼓励网红群体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

做好网红群体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对此，江苏各地统战部门着力引导网红群体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现场教学、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强化网红群体红色教育，邀请部分网红参与重大项目打卡活动，引导他们讲好江苏故事、中国故事。二是发挥网络直播天然属性，打造一支正能量网红队伍，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发展。例如，“乡村振兴e路同行”网络主播乡村采风行活动组织20余名网红了解乡村特色产业。三是以现有网络人士联谊组织为载体，积极引导网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在服务民生的同时提升自身

的思想认知。

（二）网红群体统战工作面临的困境

1. 群体困境：规模持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

目前，随着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以网络主播为代表的新兴职业成为新一代年轻人追捧的对象，加之一些MCN机构、直播平台准入门槛较低，导致大量新就业群体涌入，网红群体呈现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且短期性、流动性在不断增强，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统战部门建立长期联系、开展教育培训的难度。此外，网红群体构成与特征受到地域、直播平台、企业需求、竞争压力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他们综合素质良莠不齐，这不利于采用统一的统战工作方法，对分类分层统战工作的要求更高。

2. 监管困境：组织归属多样，管理规范模糊

受到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现有网红群体在组织归属、内容创作、受众群体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性，而且，不同MCN机构、不同直播平台之间的管理规范标准并不完全统一，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实际监管的难度。例如，MCN机构的网红由于组织归属明显，在主动接受监督上更加积极，而个人网红只受到平台内容审核的单向度制约，更容易通过一些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博取眼球。同时，受到地域文化和地方发展的影响，不同地区对网红群体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对不同网红的辐射范围缺乏清晰的认知，这也带来了监管上的实际困难。

3. 工作困境：多部门协作不充分，队伍建设存在不足

网红群体统战工作作为网络统战的重要方面，不仅需要各级统战部门积极投入，更需要包括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各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但目前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依然存在，协同合作的工作合力仍需加强。此外，基层统战干部往往身兼数职，没有精力深耕网红群体统战工作，对网红群体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由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网络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统战

干部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手段往往处于滞后状况，这也造成了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实际困难。

四、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介入路径

目前，网红作为新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迅速成长期。对此，统战工作需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把具有自媒体属性、原子化的网红凝聚成一个联系紧密、具有社会价值的组织化群体；二是如何对网红群体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帮助他们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三是如何有效动员网红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正能量。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点多面广既是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特点也是难点，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一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及时把网红群体纳入统战工作总体布局，定期研究部署，抓好督促落实。二是支持和帮助网红比较集中的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建立党组织，以党建促统战。同时，通过设立统战工作机构或联络员岗位等方式，保障统战工作有序开展。三是进一步完善统战部门牵头，各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增强成员单位间的紧密协作，积极推进部门间平台共建、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包括大数据、区块链等在内的新技术手段，建立网红群体资源数据库。通过制度优化与资源整合，提高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整体效能。

（二）抓好“关键少数”，注重网红群体的分类分层引导

网红群体数量大、分布广，而统战部门开展工作的资源、精力有限，较难在网红群体统战工作中面面俱到。因此，要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归属的网红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因势利导。要重点关注时政评论类、知识普及类、传统文化宣传类及相关领域专家解读类等自媒体网红，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培训，保证他们了解、认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不同群体内部

要善于抓住“关键少数”，对影响力大的“头部网红”“流量明星”要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坚持“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要掌握这部分网红线下的组织归属，根据网红群体的线下社会属性和组织归属建立有效联系，以“组织”为抓手开展思想引导工作。

（三）强化双向沟通，思想引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具有相互对话、共谋发展的协商属性，也具有凝聚共识、增强价值认同的社会支持功能。网红群体处在网络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对其开展统战工作的核心应是基于相互理解而开展的协调一致的共情行为。因此，统战工作要适应网络发展环境，有针对性运用公共传播技术手段，实现“团结人、组织人”的目标。此外，统战部门要了解、掌握网红群体的思想动态和利益关切，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服务与引导有机结合，用力用心，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对已纳入统战视野的网红要有意识培养吸纳，变统战工作对象为统战力量。

（四）坚持底线思维，提升网络平台治理效能

要积极强化MCN机构、短视频平台等互联网企业在网红群体统战工作中的作用，强化底线思维，健全监督机制，让互联网企业守好网络发布的第一道防线。要重点做好短视频平台管理者统战工作。短视频平台管理者可以从平台管理层面面对平台发布的短视频内容进行把关审核，能够成为平台传播导向的掌舵者和策划人，要将对他们的思想引领作为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国外MCN机构的运作模式和经验，引入市场化良性竞争机制，优化MCN机构在网红孵化和培养上的方式方法，让MCN机构成为打造正能量网红的前沿阵地。

（五）充分发挥作用，引导网红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要激发网红群体在创新创造、服务社会和舆

论引导等方面的热情,把“最大变量”变为“最大增量”。要建立正能量网红培养激励机制,通过教育培训让网红真正“红”起来。要发挥短视频的独特优势,鼓励网红群体立足各自擅长领域,在重大、热点问题上正向引导、多维发声,与主流媒体形成良性舆论共振,让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探索网红经济服务经济社会的多重方式,引导网红群体借助自身平台、用户、内容、技术等优势,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Bronfenbrenner U. Contexts of Child Rea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10): 844-

850.

- [2] 韩克庆. 比特时代对人类社会的重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 96-101.
- [3] 武丽志, 张妙华. 从 Web1.0 到 Web3.0——区域文化网络传播的模式演替[J]. 科技传播, 2015(3): 10-13.
- [4] 喻国明. 关注 Web2.0: 新传播时代的实践图景[J]. 新闻与传播, 2006(12): 33-35.
- [5] 熊国荣, 黄婉婷. 个体化理论视域下虚拟网红的身体实践与情感连接——以 Lil Miquela 的传播实践为例[J]. 编辑之友, 2022(9): 51-60.
- [6] 刘媪, 吕欣. 网红经济与MCN管理机制研究[J]. 传媒, 2023(3): 86-89.
- [7]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 2000(2): 33-58.

责任编辑: 吉强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统战工作研究

张伟伟 吉 强

摘 要: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是平台经济时代涌现的新职业群体。他们的发展壮大,对于稳就业、保民生,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对该群体开展统战工作,仍然面临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力量不足、对策不准等问题。对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从业人员、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中的青年群体进行调查,分析他们的群体画像、政治思想和行为特征,以此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平台经济;新职业青年;统战工作

近年来,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推动下,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精细的新职业应势而生,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在新媒体平台、直播平台、社交平台、电商平台、众包平台等各类互联网平台组织中,青年就业群体大量涌现,发展迅猛。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以微信、抖音、快手、京东、淘宝、美团、饿了么等为代表的平台,2021年为当年约27%的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1]。在平台就业中,青年群体是重要群体。以社交平台微信为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显示,72.5%的微信小程序从业人员、57.8%的微信公

众号从业人员、48.3%的微信视频号从业人员,其年龄在35岁及以下^[2]。随着平台就业成为青年群体的一种普遍选择,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规模在持续增长,他们在稳就业、保民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将能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统战工作对该群体的对象范围、规模数量、群体特征以及思想动态等基本状况掌握得不够充分,仍然面临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策不准等问题。对此,本文基于与互联网平台密切相关的,有一定从业规模,具有相对独立且成熟的专业、技能要求的职业,以其中40岁以下的劳动者(青年)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

收稿日期:2024-03-31

作者简介: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副教授,江苏网络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社会分层、网络统战;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四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互联网与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政治引领研究”(ZK202302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访谈的方式,对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从业人员、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中的青年群体进行调查,分析他们的群体画像、政治思想和行为特征,以此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 平台经济与新职业

“平台经济”的概念以“平台”为基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把“平台”界定为“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在学界及业界,平台一般被认为是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以信息、资本、数字、流量作为核心要素,为供需双方提供信息交流、对接交易的交易场所^[3]。根据平台的连接对象和主要功能,平台可以分为六大类,分别为网络销售类平台、生活服务类平台、社交娱乐类平台、信息资讯类平台、金融服务类平台、计算应用类平台。根据平台体量,平台又可分为三级,即超级平台、大型平台、中小平台。其中,超级平台是指同时具备超大用户规模、超广业务种类、超高经济体量和超强限制能力的平台,大型平台是指同时具备较大用户规模、较广业务种类、较多业务范围、较高经济体量和较强限制能力的平台,中小平台是指具有一定用户规模、有限业务种类、有限经济体量、有限限制能力的平台^[4]。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经济形态。数据是平台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和创新原动力^[5]。一方面,平台通过提取、占有和使用海量的数据资源,将之作为可供平台出售的“数据商品”,帮助生产商和广告商改进生产活动、定制宣传策略,进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数据为消费者提供在线服务,如音频分享、社交互动等。此外,平台还利用数据信息分析经济行为及经济现象,进行供需匹配,促进交易开展^[6]。

近年来,平台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愈加突出,已经成为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就业结构层面,学者指出平台经济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促进就业模式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以微信、抖音、淘宝等为代表的超级平台产生了大量新职业,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催生“企业+平台+个人”以及“平台+个人”等多种新就业形态^{[7][8]}。与此同时,平台经济模式带来的劳动剥削问题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者指出,平台经济使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更为隐蔽和精密,一方面通过算法分配任务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精准控制和监督管理,又以算法和用户评价驱动的绩效考核促成劳动的内卷,另一方面通过以“兴趣和梦想”“自由与灵活”作为劳动的假象,降低劳动者的抵抗意愿^[9]。在平台经济模式中,平台与劳动者往往缺乏固定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多以灵活用工的形式为平台企业服务,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这种特殊劳动关系本质是资本利用数字信息的所有权优势对劳动者剩余价值进一步压榨的新型模式^[10]。

(二)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

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学界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整体性研究比较少,更多的是基于新职业本身对该群体进行分类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平台型新职业群体包括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自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员等。这些研究从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切入,关注这些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的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劳动权益、职业认同、职业规范、职业发展等问题。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认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是一个正在扩张的新兴青年群体,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往往能最直接、最快速地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变迁新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新行业的“晴雨表”^[11]。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具有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的基本特征^[12],存在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路径欠缺、就业极化、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融入不畅等问

题, 这些问题对现有教育培训体系、社会治理、制度安排提出了新诉求^[13]。因此, 未来研究需在认真探究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职业精神内在要求的基础上, 探讨对青年职业精神养成的引导和培育, 增强青年职业发展后劲的问题^[14]。同时, 未来研究还需关注完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政治参与制度、建立系统的支持服务体系、规范相关行业制度, 以及督促平台企业建立科学合理工作评估机制等方面的问题^[15]。

二、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群体画像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以下突出的群体性特征。

文化程度上以“本科”为主。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调查数据显示, 他们中本科学历占比为 63.6%, 大专学历占比为 22.4%, 大专以下学历占比为 7.1%, 研究生占比为 6.9%。

经济上“中低收入者”占多。调查显示,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年收入差异较大, 既有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 也有年收入低于 5 万元的低收入者。从占比来看,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年收入主要集中在 3 个区间, 即“5 万元以下”(19.0%)、“6 万元—10 万元”(32.4%)和“11 万元—20 万元”(27.3%), 三者合计占比达 78.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5.2 万元^[16]。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主要为中低收入者。在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 “21 万元—30 万元”的占比为 9.4%, “31 万元—50 万元”的占比为 5.0%, “50 万元以上”的占比 6.9%。

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在受访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 他们的政治面貌主要是“群众”, 占比为 49.8%, 中共党员占比为 22.6%, 共青团员占比为 16.8%, 民主党派成员占比为 5.5%, 无党派人士占比为 5.3%。

工作较为稳定, 但职业流动性强。在受访对象中, 认为自己工作“非常稳定”和“比较稳定”

的占比分别为 14.7%、49.2%, 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和“不大稳定”的占比分别为 5.0%、7.2%。不过, 他们具有很强的职业流动性。调查发现,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从业以来换过“1—2 次”工作的占比为 45.0%, 换过“3—4 次”工作的占比为 25.2%, 换过“5 次以上”工作的占比为 7.4%, 合计占比 77.6%。

自我阶层认知为“中间阶层”, 看好自身发展。就自我阶层认知而言, 在阶层认知的 1—10 个等级中,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回答的均值为 4.26, 中位数为 5.00, 众数也为 5.00 (见表 1), 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普遍认为自身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于人生发展的预期, 75.8% 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认为未来 10 年自身所处的阶层位置会比现在要好。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非常看好自身的发展, 对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充满信心。

表 1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自我阶层认知

阶层认知等级 (1 代表最低等级, 10 代表最高等级)	
平均值	4.26
中位数	5.00
众数	5.00

有很强的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工作生活满意度, 认为社会较为公平。一是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自我效能感非常强。调查中, 考察自我效能感的 5 个题项回答总体均值为 3.93, 其中, “我对自己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的回答均值最高, 达到 4.04 (见图 1)。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自己非常认可和自信。高自我效能感无疑能够让他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 勇于面对各种困难。二是他们具有较高的工作生活满意度。考察工作生活满意度的 5 个题项回答总体均值为 3.68, 其中, “我认为自己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的回答均值最高, 为 3.76 (见图 2)。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比较满意，认为自己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三是他们认为社会较为公平。考察社会公平感的4个题项回答总体均值为3.01，其中，“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公平感最高，均值为3.14，“工作与就业机会”的均值为3.01，“每个人的发展机会”的均值为3.00，“财富及收入分配”均值为2.90(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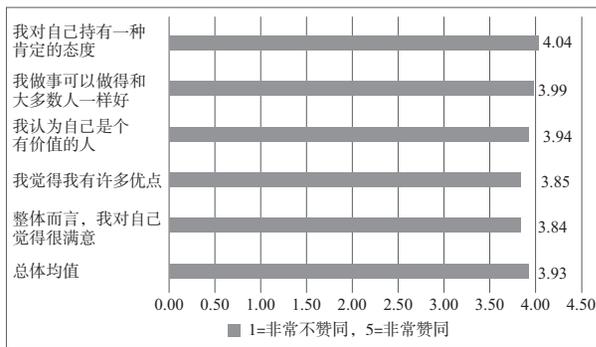


图1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自我效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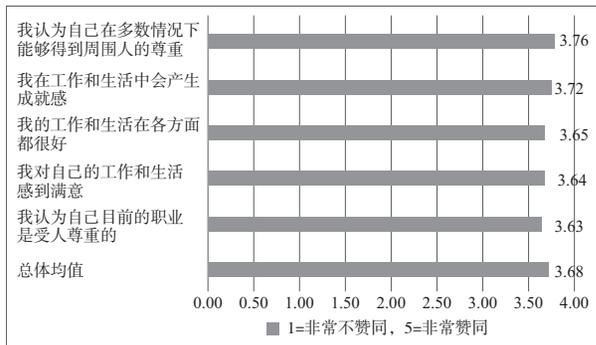


图2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工作生活满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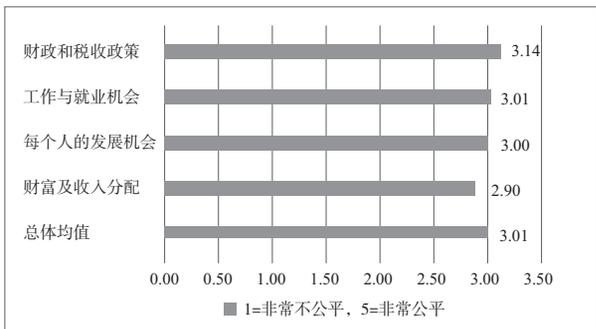


图3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社会公平感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可以用“本科”“中低收入者”“群众”“流动性强”“中间阶层”“自我效能感强”“工作生活

较满意”“社会公平感比较高”这些词语来进行群体画像。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群体画像反映出这是一个年轻、有文化、爱流动、充满自信、乐观向上的活力群体。

三、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思想与行为

(一)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是公民对政治运行机制、国家组织等基本政治信息的了解情况，它是公民政治素养的体现^[17]。本文从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三个维度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认知进行考察。调查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较高的政治认知水平。

1. 政治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均有了解

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思潮。其中，63.6%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表示“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潮，62.9%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表示“了解”自由主义思潮。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认知中，但同时，作为西方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对他们有着相当的渗透和影响。

2. 政治制度：主观认知非常高

本文采用五级量表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制度认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主观上具有很高的政治制度认知(见图4)。从趋势来看，仅1.9%的人政治制度认知值为“1.00”，即“非常不了解”政治制度，而高达91.4%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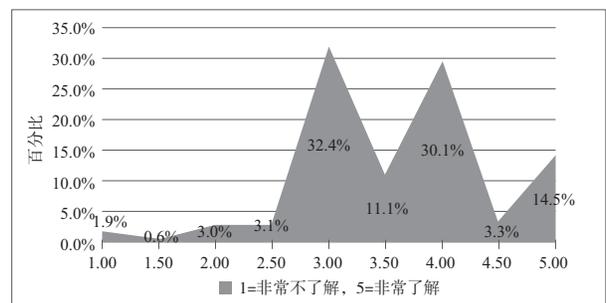


图4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制度认知

政治制度认知值超过临界值 2.50，即“了解”政治制度。从均值来看，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治制度认知总体均值为 3.60，远高于临界值 2.50，同样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很高的主观政治制度认知。

3. 政府政策：主观认知比较高

本文采用五级量表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府政策认知进行分析（见图 5）。从趋势来看，仅 3.0% 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表示“非常不了解”政府政策情况，而高达 87.9%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策认知值超过临界值 2.50，即“了解”政府政策。从均值来看，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策认知总体均值为 3.40，高于临界值 2.50，但低于他们的制度认知（均值为 3.60）。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认为自身对于政府各项政策是有一定把握的，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认识程度不如政治制度那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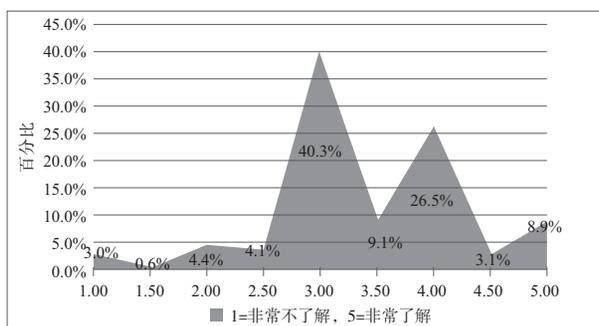


图 5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府政策认知

（二）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治认同

本文从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执政认同三个层面，采用五级量表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认同进行分析（见图 6）。调查发现，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很高的政治认同，三个考察题项回答均值都超过了 4.50（见图 8）。这反映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心理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接受，体现出他们在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世界观上对党的归属和忠诚。政党认同可以促进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社会行动中形成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支持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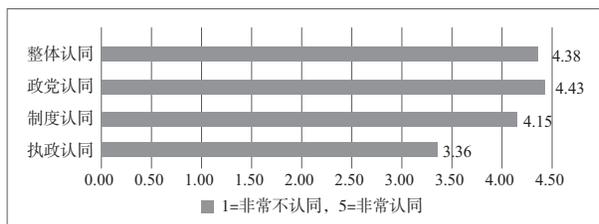


图 6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治认同

业青年具有很高的政治认同，他们整体政治认同的均值高达 4.38。他们的政党认同程度最高，均值为 4.43，说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认可度很高；制度认同程度也非常高，均值为 4.15，说明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非常认可；执政认同，即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其均值为 3.36，低于政党认同和制度认同。

1. 制度认同：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本文使用三个题项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制度认同，他们对三个题项的回答均值都很高，显示出他们非常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见图 7）。制度认同实质是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对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信任和理解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遵循与追随。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很高的制度认同，说明他们政治归属感很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信任和肯定，具有很强的制度自信。这有利于他们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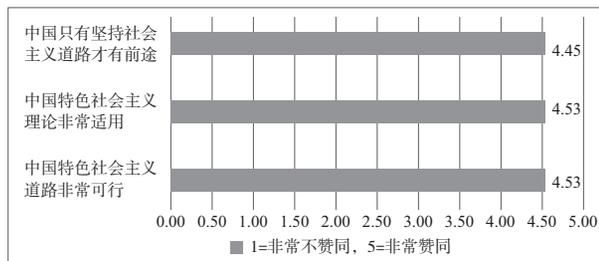


图 7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制度认同

2. 政党认同：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

政党认同所考察的是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情况。调查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具有很高的政党认同，三个考察题项回答均值都超过了 4.50（见图 8）。这反映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心理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接受，体现出他们在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世界观上对党的归属和忠诚。政党认同可以促进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社会行动中形成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支持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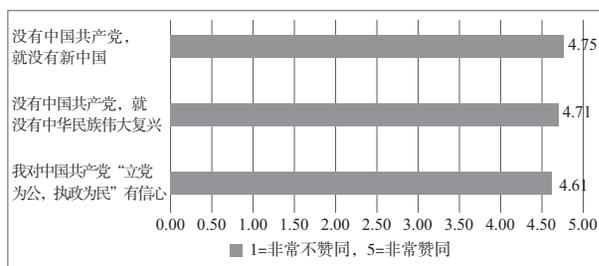


图8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政党认同

3. 执政认同：对政府执政政绩总体评价较高

执政认同考察的是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于政府执政政绩的评价，是他们对政府执政绩效的感性认识和直观体验。本文设立了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养老、劳动就业、社会救助、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建设、食品监管8个民生题项，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执政认同情况（见图9）。调查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政府部门在“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3个方面执政表现评价很高，回答均值分别是4.24、4.10和4.03。他们对政府在“食品监管”（均值为3.60）、“保障性住房建设”（均值为3.66）、“环境保护”（均值为3.71）的评价相对要低一点，但均值都超过了3.50，说明他们对政府执政表现的总体评价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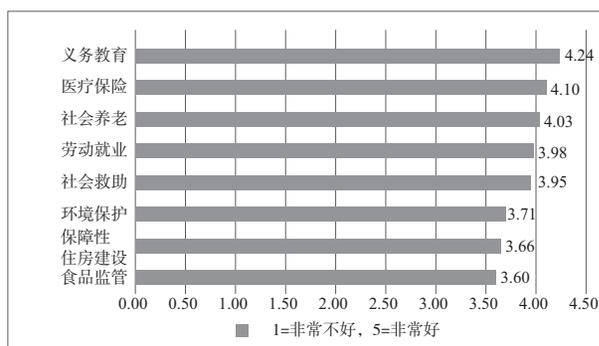


图9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执政认同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执政表现评价最高，与他们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问卷调查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占92.9%。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家境普通，他

们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从而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是义务教育的受益者，这使他们对义务教育非常满意。在访谈中，不少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谈到了教育对他们的作用。例如，有被访者表示：“教育确实非常重要，有很多人通过教育变成了‘凤凰’，虽然这个很难，但这是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小孩的出路。”（某MCN机构网红C女士，202311）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对“食品监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两项的打分相对低一些，也与他们自身经历密切相关。调研发现，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点外卖，他们对食品安全比较忧虑，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普遍期望有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认为购买房子的压力比较大，许多已经贷款买房的被访者都提及房贷对他们的压力。例如，有被访者说：“我也在还房贷，而且房贷还挺高，每个月的钱基本都花在这上面了。”（某新媒体网编C女士，202311）

（三）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政治参与：网络参政较多

本文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制度化参政和网络参政进行考察。其中，制度化参政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通过现有法律、政策及允许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情况，网络参政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通过网络途径和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

1. 制度化参政：参政渠道少，参政程度低

本文采用两个题项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制度化参政，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回答由1—5进行赋值。调查结果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制度化参政的频次不高（见图10）。其中，“参加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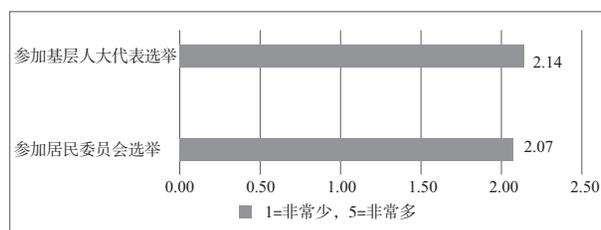


图10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制度化参政

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回答均值为 2.14,“参加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回答均值为 2.07,两项均值都没有超过临界值 2.50。这反映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较少进行制度化参政。

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制度化参政的程度低,这与他们可获得的制度化参政渠道比较少密切相关。例如,某小说平台的一位网络作家在谈及他们这个群体制度化参政的困境时说:“我其实还挺想为我们行业发声的,但就是没有渠道,我们网络作家缺乏渠道,所以网络作家经常在网站或者是论坛上发声,大家很爱国,但是没有一个正规的(发声)渠道,缺少与上面(官方)接触的通道。”(TMM, 202306)

2. 网络参政:高于制度化参政,网络问政较常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工作和生活与互联网密切相连,他们是最熟悉网络、最频繁使用网络的一个群体。本文使用 4 个题项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网络参政进行考察。

调查显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网络参政程度要显著高于制度化参政(见图 11)。其中,网络问政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通过网络渠道向政府部门咨询、了解和反馈政策和政治事务的情况,该项得分均值最高,达 2.85,超过临界值 2.50。这说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经常进行网络问政。网络协商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网络平台上与其他网民就政治事务进行协商讨论的情况,该项得分均值排名第二,也超过临界值,为 2.64。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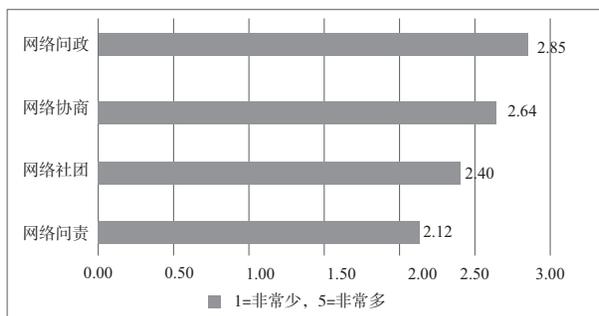


图 11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网络参政

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也经常进行网络协商。网络社团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在网上加入某个与政治事务有关的团体或组织的情况,该项得分均值为 2.40,低于临界值。网络问责考察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通过网络渠道,就特定政策或政治事务质询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情况,该项得分均值为 2.12,低于临界值,也是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得分最低的网络参政行为。

在 4 种网络参政行为中,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最常见的是网络问政,这与我国电子政务快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提供了“两微一抖”政务新媒体、主流官媒问政类栏目,以及政府网站问政版块等供网民进行网络问政的平台和渠道。在访谈中,许多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提到了网络问政的多元渠道。例如,有人表示,“其实,我常在网络上通过一些政府设置的互动栏目反馈意见,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就是比较碎片化”(GYQ, 202305),“我没有什么正式渠道(参政议政),就是在网上发言,例如去政府官方微博上留言,我发现政府是有反馈的”(FYS, 202305)。

四、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统战工作对策

(一) 及时跟进、动态调整,提升统战工作覆盖面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是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而涌现的新兴青年群体。在平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推动下,相关新职业将不断涌现,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群体规模会持续扩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与 2015 年版相比,净增了 158 个新职业,其中有 97 个是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数字职业,包括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据库运行管理员、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商务数据分析师等。对此,面向青年群体的统战工作,在对象、范围、主要任务等方面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变化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同步调整。一方面,面向青年群体的统战工作需要及时把平台型新职

业青年纳入工作重点，深入掌握他们的群体特征，动态调整工作方式方法。例如，对于平台雇佣型和机构雇佣型新职业青年，统战部门可以依托平台和机构，掌握他们的群体规模、发展趋势、个体影响力大小等情况；对于自我雇佣型新职业青年，统战部门要侧重以他们工作或生活所在社区为工作空间，建立点对点联系和动态追踪渠道。另一方面，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开展统战工作，涉及平台经济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新社会阶层等多个方面。这需要创新制度载体，建立健全新职业青年统战工作的分工协调机制，汇聚全党和全社会力量，形成统战部门牵头、多部门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大统战工作格局。

（二）建构多元平台体系，促进新职业青年的再组织化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内部差异大。因此，团结各平台的职业青年不能单一地依靠互联网企业。未来，面向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统战工作可以着力打造以党群组织为主体，以社会组织和自组织为两翼，多元组织平台相互共生、并行发展的体系。通过多平台联动，形成合力，让越来越多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由体制外的“自由人”变成共生型组织的“社会人”，以及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责任人”。

一是突出党组织核心地位，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立足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带统战”，以党的各级组织作为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组织化的领导核心和组织依托。要积极推动平台组织、新业态机构等平台型新职业青年劳动从属组织的党建工作，创新、优化党组织设置形式与工作方式，明确统战工作联络员。要发挥广大党员在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吸纳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的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发挥他们在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中的团结引导作用。

二是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强化群团组织的政治属性，提升他们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教育引导、价值输出的政治功能，推荐、安排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杰出代表进入群团组织，发挥他们对其他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宣传引导工作。

三是将统战要素“嵌入”到社会组织发展之中。重点关注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具有影响力、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如满足他们社会参与需求的公益慈善组织、服务他们事业发展的行业交流组织），通过统战工作的主动嫁接和粘连，将其转化为统战性社会组织，发挥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的动员、辐射、指导作用。

四是将自组织作为新的关注点和发力点。依托网络社区、贴吧、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粉丝群等线上自组织，通过开展网上教育培训及网络沙龙等活动，团结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统战部门要加强对自组织中表现突出的新职业青年的关注、吸纳和培养，帮助他们成长为群体中的关键性人物，通过他们以点带面，以个人魅力和社会威望团结引导更多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

（三）分类分众施策，推进统战工作精准化

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内部差异性大、现实处境并不相同，坚持因人而异、分类引导是推进青年统战工作精准化的关键。对于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收入较高、政治诉求较强的人员（如自媒体大V、头部网红主播、互联网科技新贵），可以在吸纳优秀分子入党、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引领、加强组织联系与阵地建设、拓宽参政议政渠道、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等方面发力。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中收入较低、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制度身份认可较低的青年群体（如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应加强对他们的权益保护，充分保障该群体的劳动权益和市场收益，让他们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于发声能力最强、思想观念活跃且掌握一定话语权的自媒体从业人员、新媒体运营人员等，在尊重他们个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他们的精神感召，培养他们的

大局意识，激发他们的价值认同。

（四）政治关心与生活关心相结合，优化发展环境

对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思想引领，不仅要关心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表现，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新职业”大多数属于新就业形态，职业的劳动保障尚不完善，职业的稳定性不强，职业的发展前景也没有可以依循的前例。在此情况下，统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与人社、网信、司法、宣传等部门的沟通协商机制，了解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的实际情况，及时反映他们的合理诉求，推动相关部门在劳动权益、知识产权、职业发展等方面维护新职业青年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及后顾之忧，优化他们的发展环境。例如，从事数字技术创新领域的平台型新职业青年面临着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压力。统战部门可以联合高校、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发挥他们在促进数字技术革新、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鼓励他们走出去，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贡献力量。

（五）把握平台经济发展态势，研判平台型新职业青年新变化

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会催生新产业，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导致就业方面的新变化，这使得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群体构成随之发生新变化。因此，动态跟踪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群体新变化新特征，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做好平台型新职业青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向。这需要把握平台经济业态现状和变化趋势，深入了解平台经济的数字化、产业化、智能化等进程，关注技术研发、配套环节、生产生活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态势，跟踪业态和商业模式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岗位、职业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预判新职业青年群体中的人员结构变化，为适时调整重点工作对象范围、分层分类把握思

想动态、精准化施策、更好发挥作用等提供客观依据。

参考文献：

- [1] 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就业约 2.4 亿 [EB/OL].(2023-02-28).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302/t20230228_1350402_ext.html.
- [2] 《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2021 年微信衍生就业机会达 4618 万个 [EB/OL].(2022-08-10).<https://new.qq.com/rain/a/20220810A08EEO00>.
- [3]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2019(12)：62-81.
- [4] 关于对《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EB/OL].(2021-10-27).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samr/www/samrnew/hd/zjdc/202110/t20211027_336137.html.
- [5] 杨明.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二元分析框架 [J]. 中外法学，2022(2)：366-384.
- [6] 曲佳宝. 数据商品与平台经济中的资本积累 [J]. 财经科学，2020(9)：40-49.
- [7] 杨伟国，吴邦正.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2022(4)：2-16.
- [8] 李力行，周广肃.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与政策应对 [J]. 国际经济评论，2022(2)：46-59.
- [9] 范玉仙，王晨. 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抵抗——以网络文学平台的田野调研为例 [J]. 当代经济研究，2023(6)：26-35.
- [10] 闫慧慧，杨小勇. 平台经济下数字零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J]. 经济学家，2022(5)：58-68.
- [11] 刘哲，贾晓芬. 新职业青年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J]. 国家治理，2022(8)：61-64.
- [12] 朱健刚. 新职业转正与新阶层青年的社会参与 [J]. 人民论坛，2020(35)：106-109.
- [13] 徐保军. 当前新职业青年群体的特征、困境与应对 [J].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11): 106-110.
- [14] 黄庆平, 张振华, 吴轲威, 等. 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9): 114-119.
- [15] 黄瑾. 新兴青年群体利益诉求机制研究 [J]. 青年发展论坛, 2020(6): 43-53.
- [16] 2023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EB/OL]. (2024-01-17).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401/t20240117_1946643.html.
- [17] Carpini M X D, Scott K.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1.

责任编辑: 宋好

党建引领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实践需求与提质路径

——以青年律师高质量发展为视角

李海峰 梁鸿飞 孟睿智

摘要: 律师行业是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 党建引领律师行业统战工作对推动律所业务发展与创新、增强律所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提升青年律师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青年律师群体期待通过党建引领纾解职业压力、提高职业能力、获得职业认同, 律师行业统战工作也需依靠党建工作发挥凝心聚力效能。当前,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覆盖面不够全面, 规范化制度化有待加强,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不够顺畅, 服务与引领功能需提高, 党建工作信息智能化程度有待加强, 这些直接影响着律师行业统战工作开展的质效。应从扩大律师行业党建覆盖面、加强青年律师的思想政治建设、积极统筹推动党建所建联动、提升律师行业服务大局意识、重视数字智能手段应用这几个方面着手, 切实提高统战工作凝聚力, 画好统战工作最大同心圆。

关键词: 党建; 统战工作; 青年律师; 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引领, 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 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1]。以党建为引领做好律师行业的统战工作, 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内聚人心、外塑形象作用, 对于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 提升律师行业形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年律师^①是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本文聚焦青年律师的成长, 探讨如何

通过党建引领统战工作, 助力青年律师人才高质量发展。

一、青年律师群体高质量发展对党建引领统战工作的需求

青年律师是统战工作关注的重点群体。青年律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 但思想认识、业务能力和职业视野都有较大提升空间。以党建引领青年律师统战工作, 可以提升青年律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不断凝聚思想政治共识, 巩固党的执政基

收稿日期: 2024-03-16

作者简介: 李海峰, 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分众研究基地(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梁鸿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孟睿智,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律路径研究”(22BFX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①: 本文中的青年律师是指 40 周岁以下的执业律师。

础和群众基础，坚定人民至上的职业导向，充分发挥他们服务法治国家建设、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本文以2022年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深圳市调查报告”）、南京市律师协会公布的2019—2023年律师行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南京市调查报告”）以及调研团队关于青年律师的扎根访谈调查数据^①为分析样本，对青年律师的生存境况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明确青年律师群体高质量发展对党建工作的基本需求，为律师行业统战工作提供对策参考。

（一）青年律师群体发展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青年律师群体规模逐年扩大，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6月，全国律师总人数达60.5万，其中30岁以下律师人数占19.16%，40岁以下律师人数占67.80%，青年律师在律师群体中的占比过半。可以说，青年律师已成为中国法律服务的重要力量，青年律师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律师行业整体发展状态，也关系到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整体效果。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需要重视的群体。当前，青年律师的发展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境。

1. 执业生存压力大

从扎根访谈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青年律师认为最大的生存压力主要来自案源压力，这与深圳市调查报告的结论大体一致。该调查报告显示，认为最大压力主要为案源压力的青年律师占55.87%，其他压力包括，生活压力（13.68%），业务压力（13.43%），对案件结果（胜诉等）的压力（9.31%），处理与双方当事人、法官等关系的压力（6.3%）。

案源压力一直是青年律师最大的压力来源，从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布的数据来看，2022年青年律师案源压力的占比相较于2018年增长了23.88%。生活压力、业务压力、对案件结果（胜

诉等）的压力、处理与双方当事人、法官等关系的压力占比则比2018年有所下降。其中，对案件结果（胜诉等）的压力的占比较2018年调研数据下降35.3%，处理与双方当事人、法官等关系的压力的占比较2018年调研数据下降24.19%。

2. 单位归属感不强

扎根访谈结果显示，近一半青年律师曾经更换过执业律所。青年律师对律所的归属感不强，更换律所是较为常见的现象。深圳市对青年律师更换律所的主要原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律师认为原律所不能给自己的业务开拓赋能的占71.87%，认为加入新律所的律师团队更有利于自身业务发展的占58.24%。这说明青年律师在考虑更换律所时，最关注的是业务开拓等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因素。此外，不同类别青年律师离职的原因并不相同。授薪律师因薪资待遇（或业务收入）与预期相差较大及工作强度太大而离开律所的人远多于非授薪律师。在专职律师中，薪资待遇（或业务收入）与预期相差较大是授薪律师离开律所的最主要原因，职业规划是非授薪律师离开律所的最主要原因。无论是薪资待遇因素、工作强度因素还是业务发展因素，除了面临生存压力离职以外，青年律师单位归属感不强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提升青年律师单位归属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3. 对律所依赖性大

与单位归属感不强相对的是，青年律师对律所的依赖性却很大，两者看似矛盾，但实则符合律师行业实际。扎根访谈受访者均认为，律所应当为青年律师的发展赋能，青年律师也高度依赖和需要这种赋能。深圳市调查报告显示，青年律师认为“没有制度、缺乏计划、培训不成系统”是律所对青年律师培养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同年龄区间的青年律师均认可这一判断。在31—35岁年龄区间的青年律师中，认为“律所不愿提

注①：调研团队对江苏省内10名青年律师进行了扎根访谈，得出相关数据。

供高端业务”是主要问题的比例相对更高。这部分律师有一定的执业经验，处在职业高速发展阶段，对律所赋能的需求较强。他们希望律所能够制定较为完善的制度和详细的计划来引导和指导自己成长，期待律所能够提供较为系统的培训，帮助自己提高业务能力、拓展业务空间、实现职业和人生价值。

4. 职业发展期待高

青年律师普遍对职业发展具有较高的期待，特别是希望律所能够提供专业培训。就培训类型而言，“资深律师传授经验和业务技能”是从事不同业务类型青年律师最希望得到的培训，以非诉业务为主的青年律师更为关注“与相关行业进行交流（如法院、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机构等）”的培训，以诉讼业务为主的青年律师更希望通过“青年律师定期聚会自我交流”方面的培训来提升自我，由律所和指导律师分配业务的青年律师更关注“请专家学者进行专业理论知识讲授”的培训或沙龙。就培训内容而言，希望学习投融资、股权并购和企业合规等领域相关知识的青年律师人数占比最高，公司清算和破产、婚姻家庭与家族财富传承、刑事辩护诉讼等领域的学习需求较高，还有不少青年律师希望学习建设工程、涉税、城市更新等领域的知识。

（二）青年律师群体对党建引领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需求

从前文分析来看，青年律师群体的执业生存压力大、单位归属感不强、律所依赖性大、职业发展期待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青年律师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疏导，将不利于青年律师职业发展以及律师行业统战工作的开展。应当通过党建工作凝心聚力，解决青年律师群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助力律师行业统战工作提质增效。青年律师群体发展对律师行业党建有较为强烈的需求，可以从纾解职业压力、提高职业能力、获得职业认同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1. 纾解职业压力

当前青年律师的主要压力集中于案源压力。根据深圳市律师协会的统计数据，大部分青年律师的案件来源主要为亲戚朋友介绍、本所同事介绍及原客户介绍。深圳市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年收入 30 万元以下的青年律师，其案源前三位的排序为亲戚朋友介绍、本所同事介绍、自寻客户；年收入 30 万元至 60 万元的青年律师，其案源前三位排序为亲戚朋友介绍、原客户介绍、本所同事介绍；年收入 60 万元以上的青年律师，其案源前三位排序为原客户介绍、亲戚朋友介绍、本所同事介绍。此外，来自第三方平台推荐的案源对青年律师的收入增长影响不大。

律师行业党建能够为青年律师提供学习平台，能够促进律所同事之间彼此了解思想动态和思维方式，是增进同事合作、提高业务水平的有效途径。青年律师群体期待通过律师行业党建，获得思想引导、业务指导和执业帮助，以纾解职业压力。

2. 提高职业能力

青年律师期待通过党建工作提高职业能力，特别是期待党建工作能够与自身的职业发展相挂钩，期待能够通过党建活动高质量规划职业发展，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深圳市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职业规划越清晰的青年律师收入越高，有职业规划的青年律师收入普遍高于没有职业规划的青年律师。

3. 获得职业认同

青年律师普遍期待得到组织的关注，获取职业认同，提升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大城市的青年律师，除了面临执业压力外，还面临城市生活压力。如果律师行业党建能够为青年律师的发展提供充分关怀，那么青年律师就有更多的勇气和耐心坚守岗位，不会轻易更换单位和城市。从深圳的调研数据来看，绝大部分青年律师都考虑过离开深圳，其中包括具备较高收入的青年律师。党建工作如能为这部分律师提供更为充分的

关心关怀，那将很大程度上降低青年律师的忧虑，增强他们职业认同。

二、党建引领律师行业统战工作面临的现实挑战

青年律师群体发展对党建工作纾解执业压力、提高职业能力、获得职业认同存在较为强烈的现实需求，律师行业统战工作也需依靠党建工作发挥凝心聚力功效。但当前党建引领青年律师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一）覆盖面不够广泛

南京市律师协会公布的2019—2023年律师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市律师队伍中有党员4042人，占律师总数的36.80%；民主党派成员599人，占律师总数的5.40%；无党派人士244人，占律师总数的2.20%。全市共有律所539家，全行业建有各级党组织194个：市行业党委下属4个律所党委、2个律所党总支、44个律所党支部；各区下设律所党组织144个，其中26个为联合党支部。由南京市的情况可见，当前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覆盖面还不够广。

（二）规范化制度化有待完善

当前，律所党组织的构建、管理、活动执行及考核等方面，仍然呈现出一些不规范、不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律师行业需要通过强化党建工作和社会责任意识来凸显我国律师的“人民性”色彩和公共服务者角色^[2]，其中党建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十分重要，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部分律所党组织的制度修订工作尚未完成，部分律所未能实现党员负责人与党支部书记“一肩挑”，部分律所党组织未能按时开展组织生活和民主评议，缺乏将党员青年律师引入党建工作的制度化实践。

（三）与业务工作融合不顺畅

律所的党建和业务建设应融为一体、相互促进。目前，部分律所党组织缺乏活力和凝聚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存在相互割裂的现象，未能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从而导致部分党员律

师对党建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以青年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为例，深圳市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年未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的青年律师占比达70.9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年律师的社会治理参与度不高。

（四）服务与引领功能需提高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应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需求的总要求，推动政治引领和业务引领相统一。当前，部分律所仅开展简单传统的学习教育、集中培训等活动，未能结合律师执业实际和需求创新党建工作内容和形式，也未能突出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发展。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发挥党建工作应有的效能。

（五）信息智能化程度要加强

大数据时代，律师行业党建应当充分利用数智化辅助手段开展党建活动，吸引更多党员律师有效参与党建工作，提升党建工作的服务与引领功能。从调研数据来看，当前党员青年律师参与党建工作的意愿较高，但数智化辅助手段明显较为缺乏。青年律师面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如果不能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进党建工作，很容易导致参与意愿的降低，不利于党建引领统战工作的开展。

三、党建引领统战工作助力青年律师发展的提质路径

（一）扩大律师行业党建覆盖面

律所党组织作为律师行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积极推进律所党建全面化和优化，加强对律师队伍特别是青年律师的政治引领，提高统战工作覆盖面，切实给予青年律师单位归属感。

一是明确律所党组织建设要求。对于拥有3名及以上正式党员的律所，应明确要求其单独建立党组织；对于符合条件新设立的律所，应同步建立党组织，以保障党的组织覆盖面。为提高小型律所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可依据“以大带小”“以强带弱”的原则，推动联合党支部的建设。

在有党支部委员会的律所中，支部委员会可配备青年党员律师，更好发挥青年律师的积极作用。

二是加强党建工作的组织协调。适应律师执业特点，积极创新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新模式、新载体，如采用小型、灵活、务实的方式开展组织活动，确保党建工作有序推进，正常开展。

三是推动党建工作制度化。根据律所的实际情况和行业特点，明确党建工作的目标、职责、流程和评估标准。依托制度化、民主化手段，将党建工作方法具体化、明确化，写入律所的管理制度或律所章程，为律所党建工作的科学化、长效化提供制度框架和实施依据。

（二）加强青年律师的思想政治引领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青年律师队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作为法律制度的实践者和推广者，其思想政治素质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果。通过党建加强青年律师队伍的思想建设，有助于纾解青年律师执业的高压力。

一是积极引导青年律师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对青年律师队伍的理论武装和思想引领。以党建带动政治理论及法律法规培训，提升青年律师的理论政策素养，并进一步增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二是针对律师行业较强的专业性、人员流动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思想政治引领需采取灵活务实方式，增强党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3]，更好地以党建引领教育青年律师群体，提高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和职业获得感，最终推动他们成长为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律师。

（三）积极统筹推动党建所建联动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重心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把握好政治引领和业务引领的统一性，通过推动党建与所建深度融合，切实提升青年律师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一是以党建与所建深度融合为青年律师成长

提供双重平台。以党建工作引领，促党建与所建融合，确保两者在发展规划、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统筹协调、同步发展。例如，位于自贡市的四川德途律所推行了“四个相融”工作法，通过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相融合、支部建设与规范建设相融合、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相融合、公益服务与专业服务相融合，有效实现了党建与所建共同发展，为青年律师提供更为便捷有利的活动平台，同时增强了党建工作的凝聚力^[4]。

二是将党建工作有效融入律所日常管理和业务发展全过程、全环节。例如，推动党建工作融入业务讨论、案例分析、客户服务等方面，提高青年党员律师的参与度。构建完善的机制，发挥“党支部+党小组+律所各专业部门”的联动作用，在业务衔接、信息共享、问题研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建与所建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建立有效的党建与所建融合评估机制，定期对党建与所建融合的效果进行评估，以此不断优化工作方案，促进律所高质量发展。其中，要重视青年律师群体在发展中对党建的需求，关注他们对党建与所建融合成效的评价，发挥党建为青年律师纾解职业压力、提高职业能力、赋能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提升律师行业服务意识

律师在社会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执业行为及思想观念不仅影响到服务对象的利益，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因此，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应当聚焦社会发展，提高青年律师的服务意识。

一是引导青年律师积极投身国家发展的重要领域，提升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例如，积极助推青年律师服务民营企业和涉外经贸活动，为其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组织青年律师参与公益活动。律师不仅是法律服务的专业提供者，也应成为法治精神的传播者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律所应通过举办讲座等方式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向公

众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同时，积极参与公益诉讼、扶贫帮困、慈善捐款、支援服务的公益活动，更好服务社会。

三是推动青年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律师应利用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如联合社区开展“无纠纷小区”建设，从而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作出贡献。党员律师作为行业的先锋模范，应利用专业优势，通过调研等方式广泛征集公众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法律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五）重视数字智能手段的应用

数字化时代应当充分重视数字智能手段的运用，使党建工作对青年律师的教育引导服务等更加符合年轻人特点。

一是推进党建信息化平台建设，积极推广“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模式。围绕学、问、解等具体环节，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模块研发使用，实现对党建工作的动态智能感知、科学精准分析，打造更为便捷高效的律师行业党建阵地。

二是充分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党建效能。充分重视建立智能化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

快推进传统党建方式与信息技术手段相融合，发挥好线上、线下各自优势，实现线上线下统筹推进、作用互补，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成效。

四、结语

加强律师行业统战工作，需以律所党组织为依托，健全“党建引领+综合保障+专业赋能”的工作体系，统筹细分法律专业领域，通过上下贯通、深度融合、精准对接等，构建一体化网格联动党建体系，由此促进青年律师群体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J]. 求是, 2022(4): 9.
- [2] 杨立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律师职业建设的政策立场及其演进逻辑——基于《人民日报》报道的实证考察 [J]. 政治与法律, 2022(2): 100-112.
- [3] 崔月琴, 张冠. 转型社会的组织基础再造——以律师事务所为例 [J]. 学术研究, 2013(8): 39-45.
- [4] 四川省律师行业党委. 党建引领 融合发展——四川中小律所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J]. 中国律师, 2023(3): 16-18.

责任编辑：吉强

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

钟伟云

摘要: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角色,政党通过开展政治行动以及对政府的控制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非洲国家大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各国政党制度、政党竞争格局以及政党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从经济治理角度考察非洲国家政党制度在非洲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试图寻找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非洲国家来说,政党可以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强有力的政党有助于实现和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培养和储备治国人才。同时,执政党如何加强党建是一个长期挑战。

关键词:非洲;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角色很多,如政府、政党、议会、军队、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经济主体等。政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政党通过开展政治行动以及对政府的控制来影响国家治理过程。当然,各国政党制度不尽相同,政党控制政府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因而在国家治理中所起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探讨非洲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重点从经济治理角度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限于篇幅,本文对“经济治理”的内涵作了简化处理,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指标来衡量经济治理水平。

一、非洲的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基本情况

非洲 54 个国家中,当前除斯威士兰王国禁止政党活动以及厄立特里亚实行一党制外,其余 52 个国家都实行多党制。多党制作为一种从外部引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模式,在非洲的发育总体上看还很不成熟。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张宏明认为,非洲的多党民主浪潮虽有内部因素在起作用,但主要是外部压力的结果。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现代政党的出现在时间上晚于欧美,加上长期殖民统治的压制和独立后一党制的流行,政党政治的发育比较迟缓^[1]。这种情况决定了非洲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具有许多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此外,非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加之实行多党制的历史、从一党制改行多党制的方式不尽相同,也决定了非洲各国政党

收稿日期:2023-12-13

作者简介:钟伟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和美国政治。

政治在发育程度上的差异。非洲既有较为成熟、相对定型的政党制度，也有仍处在雏形阶段、变动不居的政党制度。52个国家的政党政治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也有一些规律可循。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三个视角加以观察。

（一）非洲国家政党竞争格局

从竞争性政党政治中朝野政党力量对比格局角度看，非洲各国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2]。第一类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型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有一个政党长期主导政坛，不少政党自国家独立以来就一直执政。这类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如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等。另外，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政权更替的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国也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为两大政党势均力敌或三大政党三足鼎立型国家。在这类国家中，两个或三个主要政党力量不相上下，政权在几大政党之间轮流更替。毛里求斯、佛得角、加纳、尼日利亚以及塞舌尔属于这一类型。第三类为碎片化型国家。这类国家的特征是政党数量众多，政党本身的变化及政党间的分化组合十分频繁，没有一个或几个政党力量足够主导政坛，需要众多政党结成联盟才能取得选举胜利。非洲中部和西部多数国家，特别是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大都属于这种类型。

（二）非洲政党的功能

在政党政治发育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功能相对完善。虽然不同政党制度下政党运作方式各有千秋，但总体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四种。一是政党作为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汇集本阶级或阶层民意，提出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二是进行社会动员，特别是通过开展政治活动来扩大大党影响，动员本党支持者参加投票，以取得政权或在民意代表机构中取得席位，从而将本党思想主张付诸实施。三是储备治国人才。无论是执政还

是在野，政党都具有治国人才储备库的功能。有些国家的在野党有成立影子政府的传统，有些国家则形成了人才在政府、政党和民间机构交替任职的“旋转门”制度。四是发挥监督作用。如果是执政党，在将本党成员送入政府后，就要监督他们的从政表现，及时进行纠偏；如果是在野党，则要监督执政党的施政方向，并运用本党影响力予以制衡。

非洲国家的政党多数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运作机制、功能定位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有一些共同之处。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非洲国家政党的功能总体上比西方发达国家弱得多。在提出思想理论和政策方面，非洲政党的水平与能力普遍较低，政策研究能力弱，党内缺乏政策讨论的机制，许多政党根本就没有系统的政策主张，只有简单的政治和竞选口号。在社会动员方面，非洲许多政党都是选举党，只在选举期间开展政治活动，一旦选举期结束，政党活动也就归于沉寂，许多小党甚至销声匿迹。在储备人才方面，非洲政党普遍缺乏人才自由竞争的机制，族群和裙带关系、个人忠诚而不是能力决定人才的发展空间。因此，非洲多数政党不能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治国人才普遍匮乏。这些情况决定了非洲国家政党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有许多先天不足。

（三）非洲政党与国家权力

非洲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紧密型。在这类国家中，执政党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不仅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决定政权机关的重要人事安排，有些国家甚至警察、军队的领导成员都是执政党成员。这类执政党大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决策机构（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委员会）。前述一党长期执政国家的执政党大多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松散型。在这类国家中，政党最主要的功能是动员支持者参加选举投票，将本党候选人送上国家权力位置。一旦使命完成、选举期结束后，政党活动就趋于沉寂。

政党领导机构与国家权力机关保持一定距离，任命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人的权力主要由同时担任政党领袖的总统（总理）行使。这类政党大多组织较为松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议事决策机构。前述政党竞争格局碎片化型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型。三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的中间型。在这类国家中，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既没有第一类国家那么密切，也不像第二类国家那样边缘化，总统（总理）府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总统（总理）也需要政党领导机构的支持来施政，在作出重要决策时会征求执政党高层的意见。前述两党势均力敌型或三足鼎立型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

二、非洲国家的经济治理

非洲是世界各大洲中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联合国认定的全球 2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占了 23 个。以联合国确定的每人日均收入 1.9 美元贫困线标准，非洲在 2015 年有 35.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6.8 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非洲的绝对贫困率为 34.0%，是除非洲外世界平均水平的 9 倍。其中，10 个非洲国家的绝对贫困率超过 50.0%，南苏丹超过 80.0%，布隆迪、马达加斯加、中非和刚果（金）超过 70.0%^[3]。

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总体落后，但各国的情况差异较大，在经济治理方面可以说非洲内部存在“四个世界”。

（一）治理水平较高、进步较快的国家

非洲经济治理良好的国家不多，约占非洲国家的六分之一，埃塞俄比亚、卢旺达、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塞舌尔、佛得角、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是这类国家的代表。这类国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基础原来并不算好，自然条件也并非得天独厚，但分别走出各具特色且较为成功的发展道路。

埃塞俄比亚原是非洲和最落后国家，1990 年人均 GDP 不到 100 美元。1991 年，由泽纳维领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以下

简称“埃革阵”）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专制腐败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政权。在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的探索，埃塞俄比亚经济从 21 世纪初开始起飞，2006 年—2017 年，GDP 年均增速超过 10.0%，为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4]。1991 年—2022 年，在人口从 5000 万增加到 1.23 亿的基础上，埃塞俄比亚人均 GDP 从不到 100 美元增加到 1027 美元^[5]。

卢旺达是非洲经济发展的新星。卢旺达位于非洲中部，国土狭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部族矛盾曾长期困扰该国。1994 年，卢旺达发生死亡 80 万人至 100 万人的种族大屠杀，由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以下简称“卢爱阵”）武装夺取政权。在卢爱阵政府的治理下，卢旺达在短时间内基本治愈了大屠杀创伤，经济得到恢复并实现持续增长。1995 年—2015 年，该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8.0%^[6]；2014 年—2019 年，卢旺达经济年均增长率提高到 9.2%^[7]。新冠肺炎疫情对卢旺达的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使其 2020 年经济增速降至 3.4%，但该国经济在 2021 年实现强力反弹，增长率回升至 10.0%^[8]。这表明卢旺达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不利国际经济环境方面的政策得当。

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国家。该国位于南部非洲，博茨瓦纳民主党自 1966 年国家独立起一党执政至今。在该党领导下，政府执行稳健经济政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未出现大起大落。在独立后的 30 年间，该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9.0%，人均 GDP 从独立之初不到 100 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7737 美元^[9]。

（二）经济发展缓慢但相对平稳的国家

这类国家约占非洲国家数量的五分之一，典型的有毛里求斯、塞舌尔、纳米比亚、加纳、科特迪瓦、佛得角、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这些国家大多政局比较稳定，一些国家的政权在政党间实现了一次或数次轮替，政权交接平稳，政策

未出现大幅度摇摆,经济增长多年保持中速且平稳。这些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成果累积下来,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显著改变,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在现代化进程中位于中等偏上位置。

毛里求斯是资源贫乏的印度洋岛国,甘蔗种植和制糖原是主要产业。自1968年独立以来,历届政府实行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坚持自由市场发展方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多元化产业政策,在制糖业外逐步形成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和信息通讯业四大经济支柱。该国数十年间经济保持中速增长,人均GDP从1976年的794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10134美元,被誉为“毛里求斯奇迹”^[10]。

塞舌尔与毛里求斯同为印度洋小国,人口只有10万多。1977年独立以来,塞舌尔人民党领导的政府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致力于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据世界银行数据,该国2022年的人均GDP按现价计算达到15874美元(按2015年固定价计算为17117美元),为非洲人均收入最高国家,其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5%^[11]。

纳米比亚1994年独立以来,人组党一直执政至今。在该党领导下,纳米比亚政府执行比较稳健的发展政策,经济实现较为平稳的发展。2000年—2015年的GDP年均增速为3.1%,人均GDP从1994年的2352美元增至2022年的4911美元^[12]。增长速度虽不算快,但向上的势头较为稳定。

(三) 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国家

这类国家大多集中于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数量较多,约占非洲国家数量的一半左右。它们有的政治动荡,暴力恐怖活动频繁;有的经济管理混乱,腐败盛行;有的政府失能,政策混乱,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有的政治与经济治理失败相互交织。像刚果(金)、加蓬、喀麦隆、安哥拉等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本来具有发展成为繁荣国家的潜力,但糟糕的治理使其潜力无法得到发

挥。还有一批国家,如苏丹、南苏丹、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乍得、中非共和国、几内亚、几内亚比绍、索马里等,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均在全世界最低行列,人均年收入大多都在600美元以下,而且近中期内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许多国家债务管控能力低下,陷入债务累积、减债、再累积、再减债的循环。当前,许多国家债务又处于累积和上升阶段,而国际社会缺乏减债意愿和行动,导致债务问题再度突出,一些国家已处于债务违约边缘。

刚果(金)是非洲国土面积第二大国家,矿产资源种类和储量极为丰富,被誉为非洲“资源宝库”。20世纪60年代独立时,有西方学者认为该国最有希望成为非洲的“超级大国”,但长期战乱、政治动荡、腐败和专制统治彻底破坏了该国发展潜力,使该国位列非洲最贫穷国家之一,2022年的人均GDP仅为586美元,近70.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3]。

南苏丹是发展严重滞后的另一典型。2011年脱离苏丹独立后,该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诸项指标没有明显改善,一些指标反而恶化,在全世界排名垫底。经济多样化努力未取得任何进展,除石油开采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产业。农业基本处于“刀耕火种”的小型生存农业状态,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石油产业占该国GDP的75.0%和国家财政收入的98.0%。但由于产量问题及国际市场油价起伏不定,石油收入时多时少,造成经济状况极不稳定。且石油收入多被政府官员贪污挪用,或用于内战,没有转化为就业和居民收入。该国2012年的GDP下降55.0%,2016年又下降23.0%。2021年,该国1450万人口中,有230万难民,8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助,17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14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14]。

(四) 经济发展停滞和倒退的国家

非洲有一些国家在殖民统治时代打下了较好经济基础,但独立后由于治理失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南非和津巴布韦是其中

两个典型。

南非原是非洲经济首强，也是非洲经济最为多样化、工业门类最齐全、基础设施最先进、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均收入亦居非洲国家前列。但 1994 年结束种族隔离，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台执政以来，经济总体上停滞不前，现在经济总量已落后于尼日利亚和埃及。2004 年，南非经济总量按当年汇率计算与中国广东省大致相当，都在 4000 亿美元左右。2021 年，广东省经济总量升至 12.44 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约 1.80 万亿美元），而同年南非经济总量为 4197 亿美元^[15]。这表明多年来南非经济几乎原地踏步。当前，南非处于严重治理危机之中，腐败横行，治安问题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仍在增加。据南非政府财政部长戈东瓜纳 2022 年 10 月在议会所作的《中期预算政策报告》，2022 年南非经济仅增长 1.9%，预计此后 3 年年均增长 1.6% 左右^[16]。

津巴布韦是经济治理出现严重倒退的典型。该国位于非洲南部，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独立前已经有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工业化水平仅次于南非，基础设施也比较发达，农业的商业化水平较高，市场发育情况良好。1980 年，津巴布韦取得独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以下简称“津民盟”）长期执政，穆加贝把持党政大权，直至 2017 年被军方发动的不流血政变推翻。该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尚可，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津民盟政府执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先是不顾国情实行高福利政策，后又实行杀鸡取卵式的土地改革，经济开始下滑。21 世纪以来，津巴布韦经济处于持续衰退状态，生产下降，基础设施日益破败，财政收入下跌，通货膨胀高居不下，货币崩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2000 年—2010 年，该国 GDP 年均下降 4.9%，是同期非洲乃至全世界表现最糟糕的国家^[17]。2009 年，该国被迫放弃本国货币，改而以美元和南非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后来虽然恢

复发行本国货币，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继续困扰该国。据非洲开发银行数据，该国 2019 年经济萎缩了 6.0%，2020 年进一步萎缩了 10.0%。通货膨胀率从 2019 年的 226.9% 飙升至 2020 年的 622.8%。此后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在 2022 年 9 月仍高达 280.4%。自 2000 年以来，该国就开始债务违约，国际金融机构已停止向该国提供新贷款^[18]。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 年该国人均 GDP 仅 1267 美元，39.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预期寿命仅 59 岁^[19]。

三、非洲政党制度与经济治理的关系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与经济治理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凡是经济治理比较好、经济进步较快、社会稳定的国家，大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有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党与政府的联系比较密切。前文所述经济发展较快、国家治理良好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博茨瓦纳、塞舌尔、纳米比亚等，都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而经济治理赤字严重、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的国家，大多都是政党竞争格局碎片化的国家，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松散，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弱，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两党势均力敌或三足鼎立型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上述两类国家中间，发展进程相对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社会也比较稳定。毛里求斯、加纳、佛得角等国属于这一类型。当然，上述现象并非绝对，每一种类型也有例外情形。

如何解释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与经济治理的这种关联性？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强大政党为国家政治稳定提供了保证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便无从谈起。而落后国家想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要条件。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府

不仅要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而且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强大的政党”与“强大的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强政府”的维持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20]。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和中国学者林毅夫等人也认为，对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赶超型现代化，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在非洲，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和强有力的政府，连最起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法维持。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都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才在大动乱之后实现并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特别是卢旺达，能从1994年大屠杀后的极度混乱走到今天的地步，与执政党卢爱阵强大的控制能力密不可分。埃塞俄比亚有80多个民族，民族矛盾长期以来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1991年以后，在埃革阵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实现了政局的稳定，民族矛盾暂时得到了压制，但不幸的是，执政党内部分裂引发的民族矛盾造成该国于2020年发生内战，稳定局面被打破。

相比之下，那些政党竞争格局呈碎片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中部和西部的国家，局势一直较为动荡。这些国家内战、军事政变、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活动较频繁。最近几年来，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苏丹、南苏丹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某种程度的军事管制之下。国家处于经常性的动荡之中，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强大政党较有可能提出可行的发展构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政党与一个没有理想和抱负的政党，其执政方式与施政效果必然大不一样。在上述政党力量强大、政党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国家中，政党提出政策主张即“出思想”的能力较强。这一类型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纳米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长期执政，具备一定的理论和政策

研究能力。一些政党设立了政策研究部门，或与特定的智库保持合作关系。一些政党有自己的党报党刊，作为党内开展政策讨论的平台。定期召开的党代会制定的政策文件成为指导国家发展最重要的政策文件。总体上看，这些“出思想”能力较强的政党，其领导下的政府治理水平一般都比较较高，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事业进步也比较明显。

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是两个典型的例子。1991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和1994年以前的卢旺达同为非洲被战乱破坏得最严重的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国家治理机制全面瓦解。这两个国家在大动乱之后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与两国领导人梅莱斯总理和卡加梅总统有很大关系。这两位领导人是非洲新一代领导人中最有思想、最善于思考的人。梅莱斯经过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的研究，再结合埃塞俄比亚具体国情，提出了埃塞俄比亚应走“民主的发展型国家”道路。他认为，埃塞俄比亚要实现发展，必须向东亚新兴国家学习，政府应在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但为了避免东亚新兴国家政治转型的痛苦，埃塞俄比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他明确提出埃塞俄比亚应该实行“一党独大型多党制”。实践证明，梅莱斯的发展思想符合埃塞俄比亚实际，有利于发挥该国的后发优势，是该国实现20年快速发展的秘诀。梅莱斯因病去世后，埃塞俄比亚原有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了数年。但随着2018年执政党的分裂以及内战爆发，其快速发展势头中断，近年来经济增速已经大幅下降。

卢旺达面积仅2.6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国家之一，除土地外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自然资源。如何治疗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创伤、实现经济发展，是摆在卡加梅总统面前的巨大挑战。卡加梅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要把卢旺达打造成“非洲数字港”的设想，着力发展数字经济，把卢旺达建设成为非洲的“新加坡”。经过20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卢旺达在实现上述

发展目标上已经取得显著进展。

而在政党竞争格局碎片化的国家中，政党“出思想”的能力普遍较弱。这些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动员本党支持者参加选举。选举结束后政党的领导机构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不直接干预政府施政，也缺乏有效手段去监督政府施政。

（三）强大政党有利于保持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强政党、强思想、强政府、强落实这四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强政党，就有可能产生强政府和强思想，有了强政府，就有可能将政党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国都制定了 5 年、10 年乃至 20 年发展规划，执政党长期执政为实施发展规划提供了保证。

埃塞俄比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制定并实施了几个结构调整计划，进入 21 世纪后又制订实施了两个《和平、民主与发展五年规划》。从 2010 年开始，埃塞俄比亚制定实施《增长与转型规划 I》和《增长与转型规划 II》。《增长与转型规划 I》设定经济增长的最低目标是年均增长 11.2%，最高目标是 14.9%，到 2015 年人均 GDP 达到 700 美元。《增长与转型规划 II》设定的发展目标是 GDP 年均增长 11.0%，其中工业部门年均增长 20.0%。通过实施这两个规划，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顺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空前加快，它建设了东非地区首条高速公路、首条城市轨道交通、首个风力发电厂，还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建设了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电气化铁路。

卢旺达 1994 年以后先后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与减贫战略》，并制定了《2020 年远景规划》。规划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 1240 美元），以发展信息通讯产业为重点，使整个国家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知识型经济，国民识字率达到 100.0%，贫困率降至 30.0% 以下。在成功实施上述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卢旺达政府又制定了更长远的发展规划，力争在 2035 年前实现年均 12.0% 的经济增长，2036 年—2050

年实现年均 10.0% 的增长^[21]。卢旺达政府在基加利建设了多个产业园和孵化基地，吸引了许多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基加利设立了技术学院，为信息产业培养人才。2018 年，卢旺达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在基加利建成非洲首个国际性电子商务平台，建成非洲首家高端智能手机工厂。2019 年，该国生产出非洲首辆纯电动汽车。目前，4G 网络已经基本覆盖全国，共享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开始在城市中出现。

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在民主党的领导下，经济政策一直稳健，政府连续制定并执行了 11 个国家发展规划，经济始终平稳较快发展，未出现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大起大落。独立之初，博茨瓦纳在各方面均大大落后于其邻国南非和津巴布韦，现在它的人均收入是南非的一倍、津巴布韦的数倍。

相比之下，在政党格局碎片化、政党与国家关系松散的国家，由于政局不稳、政府更替频繁，发展政策就谈不上有什么连续性。有些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发展规划，但很少能够落到实处。

在拥有稳定的两党竞争或三党竞争格局的国家，政府执行国家发展规划的能力也比较强，因为朝野力量相当，相互制衡，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时相互补充，即使政权发生轮替，新上台的政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全盘推翻前政权的发展规划。毛里求斯、佛得角、加纳、塞内加尔等国的情况都是如此。毛里求斯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坛一直由三大政党掌控，三党轮流执政，各党的政策虽有差别，但对抗性不强，因而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方向始终保持一致。这是毛里求斯得以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塞舌尔于 2020 年实现自 1977 年独立以来首次政权更替，连续执政 43 年的塞舌尔人民党在选举中失利，变为在野党，但新上台的塞舌尔民主联盟政府基本维持了前执政党的发展政策。

当然，强大政党只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一些一个政党长

期执政的国家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问题。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是，政党执政时间长了，难免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不思进取等问题。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南非、津巴布韦等国，就是执政党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官员严重腐败的典型。非洲南部的安哥拉，非洲中部的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非洲东部的乌干达，都是一党长期执政，但国家治理却存在很大问题。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领导人长期恋权不放或权力在家庭成员间传承，思想僵化，腐败问题突出。乌干达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乃至21世纪头几年，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穆塞韦尼总统执政时间越来越长（从1986年执政至今），执政党的进取精神逐渐消退，裙带关系、消极腐败等现象日益加重，经济发展势头随之受挫。应该说，执政党自身建设不力是造成上述国家发展进程停滞和倒退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有抱负、对政府有较强掌控能力的政党长期执政，对推进国家发展建设是有利的。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有助于凝聚共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环境。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政党和政府持完全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态度，国家现代化进程就可能缓慢。落后国家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应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模式。非洲国家的情况表明，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在当下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宏明. 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兼论非洲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反差[J]. 西亚非洲, 2020(6): 3-51.
- [2] 钟伟云. 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J]. 西亚非洲, 2016(5): 90-106.
- [3] Liesl Louw-Vaudran. A Multisectoral Approach is Needed to Lift Africa out of Poverty[EB/OL]. (2022-07-01). <https://issafrica.s3.amazonaws.com/site/uploads/psc-report148.pdf>.
- [4] Donnenfeld, Zachary. Emerging Giant: Potential Pathways for Ethiopia to 2040[EB/OL]. (2020-01-17). <https://issafrica.org/research/east-africa-report/emerging-giant-potential-pathways-for-ethiopia-to-2040>.
- [5] The World Bank. Ethiopia[EB/OL]. (2023-12-01).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ethiopia?view=chart>.
- [6] Musabyemariya Florence. 卢旺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后种族灭绝[D]. 厦门：厦门大学，2017：7.
- [7][21] Rwanda Tops East Africa in 2022 Economic Growth[EB/OL]. (2022-04-15). <https://furtherafrica.com/2022/04/15/rwanda-tops-east-africa-in-2022-economic-growth/>.
- [8]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2[EB/OL]. (2022-05-22) <https://www.afdb.org/en/documents/african-economic-outlook-2022>.
- [9] The World Bank. Botswana[EB/OL]. (2023-12-01).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botswana>.
- [10] CEIC. 毛里求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B/OL]. (2023-12-01). <https://www.ceicdata.com.cn/zh-hans/indicator/mauritius/gdp-per-capita>.
- [11] The World Bank. Seychelles[EB/OL]. (2023-12-01).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seychelles>.
- [12] The World Bank. Namibia[EB/OL]. (2023-12-0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NA&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
- [13] The World Bank. Congo, Dem. Rep[EB/OL]. (2023-12-01).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ongo-dem-rep?view=chart>.
- [14] McConville, Kieran. The South Sudan Crisis, Explained: 5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n 2022[EB/OL]. (2021-12-31). <https://www.concern.net/news/south-sudan-crisis-explained>.
- [15] 南非国家概况[EB/OL]. (2023-10-01). <https://www.mfa>.

- 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284/1206x0_678286/.
- [16] Enoch Godongwana. 2022 Medium Term Budget Policy Statement of South Africa[EB/OL].(2022-10-26).<http://www.treasury.gov.za/documents/mtbps/2022/speech/speech.pdf>.
- [17] Ndongo Samba Sylla. From a Marginalized to an Emerging Africa?[J].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14(41): 7-25.
- [18]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Zimbabwe Economic Outlook[EB/OL].(2023-12-01)<https://www.afdb.org/en/countries/southern-africa/zimbabwe/zimbabwe-economic-outlook>.
- [19] The World Bank. Zimbabwe[EB/OL].(2023-12-01).<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zimbabwe>.
- [20]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李盛平, 杨玉生, 李培华,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17.

责任编辑: 鲍跃华